

本文章已註冊DOI數位物件識別碼

▶ 中國大陸—東協經貿關係的開展與限制：經濟外交觀點的評析

Conducting Economic Diplomacy-The Aspects and Challenges of China-ASEAN Economic Cooperation

doi:10.30402/EAS.201807_49(1).0002

東亞研究, 49(1), 2018

East Asia Studies, 49(1), 2018

作者/Author：呂冠頤(Guanyi Leu)

頁數/Page：13-62

出版日期/Publication Date：2018/07

引用本篇文獻時，請提供DOI資訊，並透過DOI永久網址取得最正確的書目資訊。

To cite this Article, please include the DOI name in your reference data.

請使用本篇文獻DOI永久網址進行連結:

To link to this Article:

[http://dx.doi.org/10.30402/EAS.201807_49\(1\).0002](http://dx.doi.org/10.30402/EAS.201807_49(1).0002)



DOI Enhanced

DOI是數位物件識別碼 (Digital Object Identifier, DOI) 的簡稱，是這篇文章在網路上的唯一識別碼，用於永久連結及引用該篇文章。

若想得知更多DOI使用資訊，

請參考 <http://doi.airiti.com>

For more information,

Please see: <http://doi.airiti.com>

請往下捲動至下一頁，開始閱讀本篇文獻

PLEASE SCROLL DOWN FOR ARTICLE



airiti

中國大陸 - 東協經貿關係的開展與限制：
經濟外交觀點的評析

**Conducting Economic Diplomacy—The
Aspects and Challenges of China-ASEAN
Economic Cooperation**

淡江大學中國大陸研究所助理教授 呂冠頤

Guanyi Leu

(Assistant Professor, the Graduate Institute of China Studies, Tamkang University)

Conducting Economic Diplomacy—The Aspects and Challenges of China-ASEAN Economic Cooperation

Guanyi Leu

(Assistant Professor, the Graduate Institute of China Studies, Tamkang University)

Abstract

Economic relations between China and Southeast Nations have greatly expanded due to several factors. In addition to a mutual desire to expand markets, there has also been a strategic motive to stabilize political relations. China's activism conducting economic diplomacy and statecraft with its adjacent countries has been a primary impetus, aiming to improve its political and economic security. The aspects of China's economic diplomacy with Southeast Asia include a reliance on multilateralism, more on the basis of the "ASEAN plus X" model, to promote trade-related cooperation. Furthermore, China prefers bilateral and unilateral channels to conduct finance-driven investment and construction cooperation. In some instances, China has also resorted to economic sanctions and unilateral pressure over its neighboring countries. In assessing th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effectiveness of China's multifaceted economic diplomacy in the area, the domestic and regional strategies pursued by many Southeast Asian countries have imposed challenges to China. Southeast Asian nations remain concerned about asymmetric economic dependence, which has led to domestic opposition, economic diversification, and multi-front cooperative policy schemes with other competing countries. This paper will apply the concepts of economic diplomacy and security to analyze the aspects and challenges facing China-Southeast Asian economic cooperation.

Keywords: Economics diplomacy and statecraft, economic security, China-Southeast Asian relations, ASEAN, free trade agreements, One Belt and One Road

中國大陸 - 東協經貿關係的開展與限制：經濟外交觀點的評析

呂冠頤

淡江大學中國大陸研究所助理教授

摘 要

中國大陸與東協國家間經貿關係增長快速，除彼此均有因應內部發展擴展市場的需求，也有以強化經濟穩定政治關係的戰略動機，而中國大陸積極的經濟外交作為更是主要的推動力。綜觀中國大陸對東南亞國家經貿關係的發展有以下特色：以「經濟外交」為引，維護「經濟安全」為主、「以經促政」為過程、拓展「戰略安全」為目標。中國大陸對東協國家的經貿外交戰略可約略歸諸於以下層面：經貿投資外交重區域多邊協議的推動、順應「東協+x」的「東協中心性」模式，在金融援建外交上，傾以具單邊主導性的倡議，分別與一或數個東協國家進行投資或基建設施的合作。除了正向性經貿的合作，經濟制裁也可能成為中國大陸開展對外關係的手段措施。分析東協國家與中國大陸加大經濟合作的過程中，面對中國大陸經濟量體的擴張、對中經濟依賴、及中國大陸施以經濟壓力以促政經標的可能性的攀升，使東南亞國家內部團體、政策精英慮疑對政治、經濟安全甚至主權的負面影響，遂有如下因應措施。一是東協國家內部對中經濟關係的增幅擴大，仍持謹慎態度或甚有檢討聲浪，二是其經貿投資策略，依然持續其「多元化開放」、同步強化「東協中心性」的策略，避免經貿關係過度集中依賴產生外溢性。這也使中國大陸經濟外交在「以政促經」、「以經促政」的開展受到限制，在經貿外交、金融信貸、基建外交等區域或雙邊層次的推進，面臨一定的挑戰。觀諸中國大陸與東協國家經濟關係發展的變動，經濟外交、經濟安全的理論概念有助理解雙方經貿的開展與限制之處。

關鍵詞：經濟外交、經濟安全、中國大陸對外關係、東南亞國協、自貿協議、一帶一路

壹、前言¹

中國大陸與東南亞地理位置接近，雙方自1990年代回復正常交往關係以來，經貿關係發展迅速。1997年金融危機的爆發，為中國大陸與東南亞國家關係發展的轉捩點（Womack 2004, 161-183）。先是東南亞國家透過「東南亞國家協會」（以下簡稱：東協）在1997年底舉行的高峰會上，首度邀請中國、日本和南韓領導人，創建了「東協+3」與「東協+1」的會議機制。順應東協國家機制的改變，江澤民亦在1997年底首屆的東協～中國10+1高峰會，公開發表「建立面向二十一世紀的睦鄰互信夥伴關係」的演說，會後與東協國家發表首個聯合聲明。在1999-2006年間，中國大陸陸續與個別東協成員，發表數個雙邊聯合聲明（蔡東杰 2014, 103）。近年中國大陸更採取主動積極、雙多邊軌齊進的「睦鄰外交」政策，釋出各項宣誓與政策措施，強化與東南亞國家在政治安全、經貿金融、社會文化建立各式交往。2002年中共十六大確立了「與鄰為善、以鄰為伴」的睦鄰外交方針，2003年溫家寶在印尼出席首屆的「東協商業與投資峰會」時，在題為「中國的發展與亞洲的振興」的演說中，提出中國大陸將強化「睦鄰、安鄰、富鄰」的政策理念。中共在十七大後的外交佈局，也逐漸浮現四大支柱「大國是關鍵、周邊是首要、發展中國家是基礎、多邊是舞台多邊」的框架。

雙方互動的制度化，除使中國大陸穩步改革開放路徑，也使東協成為中國大陸與其他區域大國互動的中介，提升東南亞的戰略與外交地位（Ba 2006）。與東協多邊機制互動的經驗，也促中國大陸接納開展「多邊外交」，在2000年轉向主動積極，始推進塑造以中國大陸為領導核心的多邊對話機制與區域組織（Kuik 2005, 102-122）。考量東南亞國家的人口、資源、發展前瞻性、連結區

1. 感謝匿名審查人對本文的指正與建議。

域大國的戰略地位，該區域自是中共外交佈局的重中之重；畢竟，中國大陸能否持續崛起、外部環境的穩定，均有賴與周邊國家的謀和而能動。²

綜觀中國大陸對東南亞國家的政策，除持續推進安全對話與軍事交流，經貿關係發展有以下特色：以「經濟外交」為引，維護「經濟安全」為主、「以經促政」為過程、拓展「戰略安全」為目標。在經濟外交為交往主軸的指導下，其具體佈局措施，可概分為經貿外交（貿易投資）、金融外交（信貸援助）、與基建外交（公路鐵路、油管港口水壩）等，拓展深化與東南亞國家經濟關係的雙多邊合作。經貿外交重推進區域一體化，尊重「東協+X」多邊模式的引導，然在金融外交、基建外交上（或總稱金融援建外交），中國大陸採積極主導，呈現雙邊、或單極多邊的合作模式，以促相關項目的快速進展。

在中國大陸更為公開探討經濟外交正負向手段措施的開展，並力求與東南亞國家間進行廣泛多面向的政策合作時，東南亞國家也回應以正向的經濟外交措施，但面對中國大陸經濟量體的擴張、對中經濟依賴、及中國大陸施以經濟壓力以促政經標的可能性的攀升，使東南亞國家內部團體、政策精英慮疑對政治、經濟安全甚至主權的負面影響，甚有傾向採取牽制的措施。這也使得中國大陸經濟外交在「以政促經」、「以經促政」的開展受到限制，在經貿外交、金融信貸、基建外交等區域或雙邊層次的推進，面臨一定的挑戰。

以雙邊關係而言，在緬甸、泰國、馬來西亞、印尼等國，于重大經濟項目的合作，都面臨當地內部團體的批評。經濟關係的開展也尚未有效地轉變東南亞政策精英，對政治與安全議題的立場，

2. 有中國大陸學者在論大國、周邊的優先排序性時，便認為「周邊為首」更為重要，便是認識到「大國崛起需要周邊國家支持」的關鍵。見閻學通（2015）。

譬如新加坡、越南、印尼、菲律賓等國在軍事與戰略性上依然採取避險或疏離中國大陸的策略。而剛歷經國會大選的馬來西亞，其新上任總理馬哈迪，也表達對南海軍事擴張與升溫的憂慮。除卻雙邊關係隱藏的不確定因素，東協國家積極強化彼此整合、與對外的中心性與一致性，來分散多元化其經濟依賴、外交關係，來穩固東協的自主性地位。

本文將從經濟外交的主要與衍生概念，理解其內涵、與政策面向，來探討中國大陸內部就相關觀點、政策的理解。並由此概念、架構檢視中國大陸與東南亞國家經濟關係發展的面向、限制。本文第二部分將介紹主要文獻對經濟外交概念的探討，第三部分則探討中國大陸內部對經濟外交概念與應用的討論與理解。第四部分則探討中國大陸與東協國家就經貿投資外交、金融援建外交等層面的發展概況。第五部分則探討東南亞國家的內外部因素對中國大陸經濟外交，在經濟性與政治性目的推進的限制。最後則簡述相應的理論與政策意涵。

貳、經濟外交的概念與討論

經濟外交（Economic Diplomacy）的概念界定，雖然東西方學者在理論、應用與政策果效的探討未歇，但對其內涵目的有一定的共識看法。

一、經濟外交的目的性

近代在政策學理上對經濟外交的討論，可溯及至1950~60年代日本政府於1957年發表的「外交藍皮書」中。在冷戰時期多數時間，日本經濟外交反映在經濟與外交相互強化的特色，第一種是利

用外交手段，以促進經濟利益的擴大；³另一種則是利用經濟為手段實現外交目的（趙可金 2011, 56-62）。西方亦持相似的概念，G. R. Berridge and Alan James（2012, 91）便從此兩個層面定義經濟外交：一是利用外交手段解決經濟問題，包含派遣使團參與如世貿組織（WTO）類組織的談判工作、監督接收國對經濟政策的執行發展、並就如何施加影響力提出建議；二是利用經濟資源，以利益援助或是制裁懲戒的方式，達成外交政策目的，有時也被稱為經濟治術（Economic Statecraft）。

就第一項概念而言，重在以外交手段，或透過國家及其官員以談判或干預方式，就國家間經濟關係的發展，來協調修改經濟政策、應對經濟摩擦、促進國家經濟利益（趙可金 2011, 60）。換言之，國家可利用經濟資源，也可用政治影響力來影響經濟關係。主要的外交管道與手段，包含政府參與經濟情報的收集、提供、商業網絡的拓展、投資決策的建議支持、雙邊經貿磋商談判、國際組織的參與及規則制定、貿易投資協議的簽訂等（趙文志 2016, 26-28）。牽涉的經濟議題，可包含貿易投資、金融、環境、能源等議題、或是促進發展、貨物、服務、貨物、服務、勞動流通、資訊的流通與管制等項目來討論（Woolcock and Bayne 2017）。⁴

-
3. 以實務政策而言，日本外交政策便長期體現此種經濟外交的概念。受到「吉田主義」（Yoshida Doctrine）政策理念的影響，日本外交政策，多以促進國家經濟發展為優先課題。即便 是近期，有學者觀察日本對外經貿政策上，重回較積極的路線，以因應中國大陸崛起、東南亞區域經濟角色拓展的影響（reactive policy），再次積極強化日本對東南亞國家官方發展援助的計劃（Official Development Assistance，簡稱：ODA），並推動與東南亞國家在雙邊、區域自由貿易協定上的談判。但即便如此，日本與東南亞經濟外交拓展的重點，主要還是避免日本企業與商業利益在該區競爭力的弱化、同時也關注當地國家的償付能力，避免過度放貸的負面效應。見Yoshimatsu and Trinidad（2010）。
 4. 又比如新加坡為東南亞國家中，經濟發展程度最高的國家，多少得力于新加坡政府與其官員，積極地運用政策優惠、改善投資環境、政府管理效能與卓越的遊說能力，使新加坡深具開展經濟外交的優勢，廣泛吸引外資的投入。新加坡除開放招商投資，透

經濟外交的第二項指涉概念，是通過配置經濟資源與相應手段，促成外交政治目標的實現，此目的性可包含但不限於僅止于經濟目的（趙文志 2016, 35）。譬如Maaik Okano-Heijmans（2012, 65）在分析日本經濟外交的取向變化時，認為政府可同時施用不同組合的政治與經濟政策管道，來達到政策目的，而經濟手段的執行，不只限於經濟目的，也可為政治性目的，譬如例如雙多邊貿易協定、經濟援助、金融貨幣政策等，往往兼具促成政治與經濟目標的雙重作用。在此項概念的討論，因手段措施多有政治戰略目的，故常有學者將此經濟工具化的概念，指稱為經濟治術。David Baldwin便認為經濟治術的政策表現有許多種，包含了正面性的利誘（Positive Inducement）與負面性的制裁（Negative Sanctions）都意在改變施壓對象國的行為，往往政治與經濟目的兼具（Pape 1997, 93）。而Robert Pape 進一步認為，經濟施壓的手段，依目的性不同而有區別，涵蓋了因經濟摩擦而起的貿易戰爭，與以促進政治目的為主的經濟制裁與經濟戰爭，旨在迫使該國政府改變政策行為。晚近不少文獻，就經濟資源促成政治外交目的之過程，進行實證分析。針對負向性的經濟外交手段之成效，近來越行普遍。⁵

二、經濟外交的參與者與與形式措施

經濟外交的制定執行，無論是經濟或政治目的促成、或各種

過建立工業園區、雙邊投資併購等方式、東協自貿與投資協議，積極與東協國家加強經濟內部聯繫，見楊時超（2012, 111）。

5. 如Albert O. Hirschman分析戰間期，德國透過貿易的擴展，使東歐小國對其產生不對稱經濟依賴，因憂懼德國經濟制裁的可能，遂對德國政治外交政策，採取扈從的態度；見Hirschman（1980）。Jean-Marc F. Blanchard則探討國內外情勢對民生經濟福祉成本的影響，是決定施壓對象國家政治行為是否改變、經濟治術能有效執行的關鍵，見Blanchard and Ripsman（2008）。針對制裁的經濟效應與政治效果，有研究認為遭致的民眾的經濟福祉損失，要遠大於預期產生的政治成果，見Hufbauer, Schott, and Elliott（1990）、Pape（1997）。即便對經濟制裁的效益性有所質疑，卻有越來越多的國家採取經濟限制或制裁的方式，參見Haass（1997, 75）、阮建平（2005, 364）。

手段的運用，如非正式談判、自願性合作、軟性自制約束、創立具約束力的規則、到施以懲罰對抗的方式，都仰賴國家相關的部會官署、官員、組織于其中所扮演的角色。同時，為因應外部因素，也增加國家政府對經濟交易過程中，於資訊提供、介入扶助的需要。又可能因為體制與社會因素，如共黨威權國家，多以國企作為參與國際經貿的重要行為者，國家政府習於介入經濟事務，或透過政府力量強化國企在國際經貿活動的競爭力，故經濟外交必然牽涉國家行為者的介入。

但Raymond Saner 與Lichia Yiu (2003) 認為全球化下，非國家行為者如跨國企業、非政府組織、國內團體等，在對外經濟政策的制定上，其角色重要性也隨之提升，有時更可能成為積極敦促國家政府採取經濟外交的推助力。譬如學者Pekkanen、Solís與Katada (2007) 的研究指出，日本自由貿易協定的談判，多以雙邊談判緩慢推進的模式為主，便是受限于國內政治經濟因素、利益團體的影響力，為維繫大企業與中小企業間利益的平衡。因此，日本在經濟外交推進的模式上，非行為者也可能參與介入政策的制定與執行。而Maaike Okano-Heijmans (2012, 65) 則進一步認為，當政府出於政治目的考量所採取的經濟措施，多賴公部門的執行；若出於經濟商業目的考量，其採取的措施較多地有協調或促進性的正面性質，則公、私部門都有可能參與推動。

在運用相關措施作為工具手段時，可分別涉及貿易、金融資本行為的正面促進、或負面限縮等各式政策。在正向性層面，包含進出口管制的開放、市場准入、最惠國待遇的給予、貿易投資的擴大、條約協議的簽訂、信貸融資、援助建設、稅務優惠、工程計劃的支持與開發等。在負向性層面，常討論的便是「經濟制裁」的運用。Robert Pape (1997, 93) 定義經濟制裁 (economic sanctions) 是指透過限制貿易、資本的方式，對他國施加經濟壓力 (economic

pressure) , 來達到政治目的的手段。貿易措施上可運用進出口數量的限制、配額、類別管制、杯葛、關稅的增加、傾銷與反傾銷政策、禁運、交通運輸停泊的限制、人員移動與勞務提供的限制等。在金融資本限制上, 包括限縮金融信貸關係、威脅縮減暫停援助、增加稅務負擔、資產的凍結與沒收。相關的限縮活動, 甚至可擴及到第三國的公私部門與施壓目標國在貿易與資本關係上的往來, 常被稱為輔助性制裁, 又有稱第二級制裁 (secondary sanctions) , 可針對施壓目標國內部的政治精英、特定企業或社會成員, 限縮其在海外貿易金融市場的活動行為。⁶

綜論經濟外交的概念, 其特色走向是: 參與行為者的多元化、目的多樣化、與手段種類的多樣化 (趙文志 2016, 38-39) 。發起執行經濟外交的行為者雖多為國家公部門、國際政府間組織與其官員, 但隨著全球經貿體系的拓展縱深, 私部門非國家行為者, 對經濟事務的影響參與力也隨之突顯。隨著國際經濟的拓展, 國家間的依賴性、敏感性、與脆弱性相依, 也易發生摩擦的機會。也因政治議題的經濟性、或經濟問題的政治化, 增加經濟外交範圍的擴大, 舉凡貿易、投資、發展、金融、能源、規則的制定, 都可能成為操作實務中要應變處理的議題。

參、中國大陸對經濟外交概念、應用的探討

改革開放後的1990年代, 中國大陸不僅在援助的方式與政策項目更為多樣化, 近年來在量數上更有可觀的增長。約略自2004~2005以降, 「經濟外交」一詞自溫家寶于2004年政府報告中首次正式提出後, 開始普遍出現中國大陸政府的官方文件、也在學界中有

6. 見Baldwin (1985); 陳宇瞳、成弋威 (2017, 34-48); 趙可金 (2011, 56-62); 阮建平 (2005, 365) 。

著更廣泛的探討。尤其2010年後，更多的學者專家投入專文研究、亦有諸多大專院校辦理相關的探討。茲將中國大陸對經濟外交的內涵看法、預期政策作為，分述如下。

一、經濟外交的目的性：「以政促經」與「以經促政」

許多專家學者認為，經濟外交已成為外交發展的主流形式，是中國大陸施展其對外關係的基礎，其目的有經濟性也有政治性，乃是外交與經濟相互為用。一來，經濟關係成為全球化的重要特色，在國際事務的重要性不斷提升，各國對經濟利益的競爭合作，使經濟與外交的關係密不可分（田春生 2017, 87-93）；二來，中國大陸的持續成長與有效轉型，無法外於國際情勢，也使經濟利益的確保與拓展成為外交的發展基礎與追求目標（趙長峰、聶銳 2016, 23）。

由此，經濟外交的第一層目的在於「以政促經」。由政府與相關機構透過單邊、或是雙邊與多邊手段，處理經濟事務，來修正協調經濟政策、發展本國經濟、維護國家對外關係的權益（趙可金 2011, 57）。有學者認為，中國大陸自90年代以後對經濟外交的討論認識，開始重視經濟利益考量，有助於平衡冷戰時期，中國大陸外交強調政治性目的，忽略經濟理性，沒有考量財政條件與耗費對國家與人民經濟利益的損害；或只因考量政治大局，放棄利用外交手段爭取經濟利益，而影響經濟建設、與人民生活的改善。⁷因此，在2004年8月的「全國對發展中國家經濟外交工作會議」上，溫家寶便揭櫫「必須從國際政治經濟的大勢、從國內經濟社會發展的大局、從外交工作的大戰略和總方針，充分認識對…經濟外交工作的重要性」，可見其旨（人民網 2004）。

7. 如過往中共對亞拉非國援助過高，財政負擔帶來的經濟損害，應極力避免。經濟外交概念的分層釐清，有助從經濟理性，思考外交對經濟利益的促進，避免僅從政治角度決定政策方向。見周永生（2003, 40）。

在這層目的指引下，中國大陸有許多討論，認為應體認國際政治經濟情勢的變化，妥善運用外交政策，來持續中國大陸的經濟發展、維護經濟安全。第一，經濟外交可協助中國大陸穩定外部經貿關係、應對反全球化與後金融危機保護主義的抬頭與擴散到其他議題、與應付國際經濟談判遲滯等不確定因素的影響（江瑞平 2014, 41；黃瑋 2014, 32）。此外，新興經濟體與美歐等發達經濟體在全球和區域層面的競爭加劇，譬如TPP與TIPP的簽訂，新區域主義抬頭，使中國大陸在相關經濟議題，如市場經濟地位、高科技出口管制、大宗商品定價、反傾銷等問題，無法有效得到解決等（張曉通 2013, 52），均增加了中國大陸對經濟外交採取主動因應的需求。

第二、應用經濟外交措施為中國大陸提供持續成長、轉型的機會，轉化其經濟結構的弱項，維護中國大陸全面的經濟安全。多位專家學者認為，中國大陸過去仰賴中高增速、外貿出口的經濟結構，增加中國對外經濟發生摩擦爭端的風險，易受外來不確定因素干擾甚至中斷；故需透過經濟外交，降低貿易爭端、多元化進出口市場、對外金融資產的比重配置、⁸並借更多層次的經濟合作消除壁壘，擴大海外市場。除依賴外貿，中國大陸也仰賴積極投資與規模經濟，增加產能與製造業的價格競爭力，但也導致產能過剩，並擔心其產業結構在國際生產分工仍處於低端環節，自主研發和技術創新相對落後，對國際創新技術和集成技術的依賴，也加深了其經濟安全隱患。⁹中國大陸欲藉企業向美歐高科技公司透過購買

8. 故自2008金融危機後，中國大陸進行結構調整，希冀走向降低外貿依存度，與提高內需消費成長動能，逐步促使對外貿易多元化。根據中國商務部近年資料，中國的外貿出口依存度，從2008年的34.23%下降至2016年的23.32%，GDP增長對出口貿易的依賴度近年有下降趨勢。見中國商務部「中美貿易依存度一升一降」（中國商務部 2018）。

9. 譬如順差問題影響到匯率議題，造成人民幣值的波動。同時，出口與順差為中國帶來龐大的外匯存底，並大量持有美國國債與美元資產，在2013年中，美元資產持有約占其外匯存底的36.5%，美元的快速浮動，使中國大陸擔憂經濟與隨之的政治風險與隨

股權、併購方式取得科技的方式，也漸受阻礙。面對中資大舉向外併購，美歐國家漸強化監管與規則，以「國家安全」理由（曾珠 2008, 79-83），或有「危及公共秩序和國安利益」，限制對高科技等戰略性產業的併購案。¹⁰同時，面對全球與歐亞國家均處於經濟轉型升級階段，中國大陸與區域國家透過「一帶一路」經貿項目的推動，將有助中國大陸內陸沿線的對外開放、強化其與區域國家的比較優勢與整合，轉化成新的發展動力、擴大產工業升級（高虎城 2014, 5-7）。

最後，是對能源糧食等來源安全的顧慮。中國大陸依靠消耗大量能源和資源換來經濟增長，也造成對其資源和環境的瓶頸制約。中國大陸已成為世界上最大的能源生產國和消費國，但能源需求壓力大、國際市場資源價格的波動、與能源技術水平總體落後，也都是挑戰。又因工業化、都市化、環境壓力的上昇，與消費需求的增加，中國大陸已成為農產品進口國。為強化進口規模與價格來源的穩定，中共總書記習近平就提出如下看法：「要借鑒國際大糧商的做法，到全球各地糧倉去建倉儲物流設施，人家生產我們採購，掌控了糧源就掌控了貿易，就掌控了定價權」（李先靈 2015, 152-162）。簡言之，諸如上述因素使中國大陸欲透過經濟外交方式減少摩擦、增加「走出去」的機會，擴大貿易投資機會、轉移過剩產能、提升轉型與產業國際競爭力、確保能源糧食的來源（竺彩華 2015, 40-56）。

在第二個目的層次下，是「以經促政」。便是利用經濟資源，實現或促進外交與政治目標。這個目標已逐漸取得優先性。一

之的政治風險，見林樂芬、祝楠（2015, 61-62）。

10. 譬如2017年與2018年，德國聯邦政府加強外國投資新規，歐盟執委會也研擬強化審查機制，嚴審外資對重要戰略歐洲企業的併購案，都被認為是針對中資企業而來。而近期，美國川普政府三次阻止中資企業的併購案，包括阻擋有中國政府支持的私募基金併購萊迪思半導體公司與馬雲阿里巴巴旗下的螞蟻金服收購速匯金國際，以及有中資入股的博通併購美國的高通。

來，有學者認為，隨著經濟快速發展和國力與日俱增，中國大陸的國家利益無可避免地需要往海外拓展。對全球貿易與資源的依賴，將伴隨貿易爭端與地區糾紛的增加，並面臨地緣政治和戰略格局的快速變化而加劇風險，甚至可能與美國、日本、或海陸鄰國如印度、印尼、菲律賓等國發生利益的碰撞，使中國大陸遭遇戰略圍堵的可能，而被迫面臨貿易、糧食、能源或關鍵物資的貿易禁運（胡鞍鋼、馬偉、鄢一龍 2014, 5）與金融制裁的威脅。第二，強化中國大陸對外的綜合國力，有助於政治穩定，也影響經濟成長，在可控情勢下，犧牲短期成本，例如國際或區域公共財的提供，來達到長遠的經濟政治目的，是一舉數得。第三，中國大陸經濟實力與對外關係的成長，也強化其爭取國際地位，以制定國際經濟規則，來穩固其政治利益與領導地位的動機。中國大陸多位學者便指出，中國大陸正從融入參與型進入積極領導型的外交模式（李巍、孫憶 2014；竺彩華 2015；任晶晶 2015, 106-111）。尤其認為全球治理體系未能有效反應中國大陸等新興經濟體的需求，或認為中國大陸日益增長的實力，未能有效地轉化實現政治、外交、與經濟上相匹配的目標，經濟外交最迫切的任務便是要把「實力轉化成果」（張曉通 2013, 53-54）。

在此項概念指引下的經濟外交戰略，主要有三個層面。第一、透過打經濟牌逐步改善中國大陸與週邊國家的政治關係，緩解其他國家對中國大陸崛起在政治、經濟、領土議題上的疑慮。這其中的考量，有來自過往「以經促政」的成功經驗。¹¹有學者觀察中國大陸在2010後，對南海議題強硬的軍事回應，造成與東南亞國家緊張關係的升高，也增加中國大陸透過經濟外交進行關係修補的動

11. 如1997年、2008年金融危機後，中國大陸與週邊國家透過增加經濟合作、經濟援助、財政與貿易擴張政策等，緩衝匯率波動，提升了互信程度、緩和與有關國家在南海議題上的摩擦，見王簫軻、張慧智（2015, 27-32）。

機。¹²第二、中國大陸對於資源優勢的自信與利益的拓展需要，應採取更積極的外交戰略。尤其是不少學者們認為，中國大陸在2009年以後，已成為亞太地區主要經濟體的最大貿易夥伴，中國大陸應可運用更多的經濟資源佈局週邊外交，作為開創建構地區新秩序的手段，即便中國大陸完全發揮世界性影響力尚未成熟，但發揮區域影響力是可能的（任晶晶 2015, 106；陳友駿 2017, 87-97）。在此思考下，中國大陸近年提出的「一帶一路」，體現的便是積極以經濟外交手段與資源，就大週邊展開佈局；使週邊外交不僅平行其大國戰略，更可能地有突出凌駕之勢，強化中國大陸的領導地位。同時，經濟外交也被認為是輔助其他政治、軍事與社會手段，強化制度協調方式，以推動中國與週邊地區形成低程度的週邊安全共同體。¹³第三，利用經濟外交，來達到維護和改革國際經濟秩序方面的目的。一方面要突出中國大陸的優勢與內涵，注入更多中國大陸的聲音與元素；另一方面要在塑造國際經濟秩序上有所作為，強調中國大陸在全球經濟中的引領地位。按此想法，有學者認為在全球治理體系的改革上，中國大陸與其他國家透過其他多邊合作，如G20集團、金磚國家等方式，發展多元化機制，又如中國大陸主辦籌建的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和為「一帶一路」建設成立「絲路基金」與「海上絲綢基金」等，是對全球治理體系的新突破，可作為對現有主流機制的補充（竺彩華 2015, 44）。

簡言之，中國大陸對經濟外交的重視，有其經濟轉型、塑造持續崛起外部環境的內外連動需求，所追求的目標除注重經貿合作

-
12. 政治軍事關係的緊張，可見於中國大陸在2010年於南海南沙群島附近進行一連串軍事演練；2012年與菲律賓在黃岩島的武裝對峙，以及之後於南海各島礁進行快速的軍事設施的擴建。中國大陸也拒絕接受菲律賓向海牙仲裁法庭提出的仲裁結果。見 Kuik (2017)。
 13. 王毅出席2014年國際形勢與中國外交研討會開幕式併發表演講「盤點2014：中國外交豐收之年」，中國外交部（2014）。有學者認為王毅總結的外交順序是先週邊關係，後大國關係，體現立足地區與放眼全球的策略，見高程（2015, 39）；凌勝利（2018, 29-52）。

利益的提升、強化貿易投資等經濟安全、確保能源與物資的供給、塑造地緣政治環境、引領國際經濟新秩序，尤其重視在區域甚至是全球影響與領導力的發揮。

二、經濟外交的主要參與者與形式措施

中國大陸經濟外交的推動，有極大比重仰賴國家政府機關的主導。諸多分析中，中國大陸的學者專家認為「經濟外交」彰顯的是「外交在經濟領域的拓展」，是以和平方式處理國家間經濟領域的紛爭摩擦、或為了執行特定的外交政策目標。他們認為經濟外交並非是經濟交往，但凡牽涉到外交交涉層面，必涉及對特定政策的執行與國家利益的實現。因此，經濟外交的實行主體，必然是國家政府相關的組織與代表，除非受國家政府的委託授權，企業、非政府組織、與個人均不能視為推動經濟外交的主體。不同於傳統外交，經濟外交的特色是專注於對外經濟關係的開展，重在對他國政府、國際組織、或跨國公司進行官方交往活動，以促進或限縮國家間、與國際間經濟關係的方式來呈現。（韋紅 2011, 15-129；張勵 2011, 64-68；趙可金 2011；徐瑤 2013, 71-74；魏涵 2014, 79-80；李巍、孫憶 2014；周永生 2003, 39-44）。

因此，在實務層面，中國大陸經濟外交的操作，多呈現由中央政府積極主導擘籌，並指導地方政府與中央或省級國營企業進行執行的形態。但鑑於經濟事務繁複、對經濟發展的複雜影響、也為強化各部會職能的監管與協調，跨越黨政組織的中央財經領導小組，成為中央重要的決議與協調機構，于經濟外交的決策扮演要角；發展與改革委員會（發改委）除在能源與氣候談判上占有重要地位，也扮演負責統籌協調商務部、財政部在貿易、金融與投資外交事宜的獨特角色。¹⁴此外，也有研究指出，大型國企與部分省級

14. 若探究主要議題業務上扮演的角色，商務部不啻為中國經濟外交開展的最核心部分，又隨著中國將經濟外交的重心由貿易擴及到金融財經領域，財政部與中國人民銀行對

企業，在參與跨國經濟投資、貿易事務時，其企業經理人在海外案件的決定上，有獨立運作空間，而不受中央政府的監理控制，成為部分海外援助與投資項目的主導者。¹⁵

中國大陸近期的經濟外交佈局，主要重在如下形式。第一、在重點週邊國家，推動區域經濟的合作，透過締結雙邊或多邊自由貿易、投資協定等，來擴大貿易投資與商務活動、促成當地國政府降低投資壁壘、保護企業投資安全等。第二、促進圍繞資本與貨幣流動的金融合作。譬如中國大陸政府與東亞國家簽訂貨幣互換協定、或中美之間就人民幣匯率問題進行、增加人民幣作為貨物貿易結算的協議等（任晶晶 2015, 107）、或進行多邊的金融服務合作。第三、經濟援助與基礎工程援建，是中國大陸經濟外交的重要部分（趙長峰、聶銳 2016, 23）。中國大陸的外援，有為產業企業需求的外援、為協助內部省份的開發，¹⁶有為地緣政經目的、以維護穩定的外部環境；外援也被認為是輸出中國大陸軟實力，有助構建中國大陸的國際形象。但總體而言，有看法認為，中國大陸外援的利己動機較大，多以優惠貸款模式，¹⁷旨在為中國大陸促進中國產品、勞務與服務的出口，並尋求為戰略物資的開源確保（孫雲

於參與區域與國際金融、匯率貨幣等議題、提升中國大陸在全球經貿規則的制定上，扮演了更多的角色。外交部，在2012年後，分別成立了國際經濟司、國際經濟金融諮詢委員會等機構，強化其部門對經濟外交的理解與參與。見趙文志（2016, 78）；李巍、孫憶（2014, 7-14）。鑑於中國大陸對外經貿事務涉獵漸趨龐雜縱深，如何協作不同部門間在經貿外交領域的籌劃與執行、與透明度，也是影響中國大陸推展經貿外交效度的課題。見何茂春（2012, 22-23）。

15. 趙文志，中國大陸經濟外交的理論與實踐，頁80；Liou（2009, 670-690）；Gonzalez-Vicente（2011）。
16. 如「大湄公河計劃」與中國-東協自貿區等都有助中國大陸內陸省份，如雲南與廣西的開發。
17. 中國大陸的外援，一般可分為「物資援助」（多為提供實質生產或消費性物資）、「資金援助」（多為無償金融援助）、「項目工程」（多為無償援助或優惠貸款）。據中國大陸2014年發表的《對外援助白皮書》，優惠貸款佔中國對外援助總額的55.7%，高於無償援助（36.2%）和無息貸款（8.1%）兩者之和。見中國大陸國務院新聞辦公室（2014）。

2017)。援助與貸款項目多在官方訪問時進行公開宣布，但實際支出仍取決於中國大陸公司與當地政府的實際支出，故時被外界認為決策過程不透明，並有中間勾結與腐敗。¹⁸即便許多優惠貸款與援建項目帶來的實質利潤不高，中國大陸的官員與企業仍認為，這些項目為未來與當地國擴大合作爭取了潛機。

第四、中國大陸對負向的限制與制裁手段，也有了更多的討論，在實務上，中國大陸也多次採取單邊或參與多邊的制裁。中國大陸學者便認為，制裁作為不同於經濟合作與援助的一種經濟外交形式，是一種強硬但和平的手段，來實現經濟或政治的目標，或用以顯示外交信號、或促使對方改變政策（徐建華 2016, 78-83）。主要包括貿易與金融方面的限制與制裁方式。在經濟制裁的討論與運用上，主要集中在以下層面。一、研究其他國家對經濟制裁的運用，較多地關注美國的制裁方式與案例研究，如貿易制裁、金融制裁等案例。¹⁹二、討論中國大陸運用經濟制裁為外交手段的可能性。許多學者認為，隨著中國大陸成為許多國家最大的貿易夥伴、在金融援助規模的龐大，為中國大陸運用經濟制裁做為手段，提供了有利的條件。認為經濟制裁實行成本低、政策實施可控、可逆的對外政策工具，可作為解決國際爭端的手段。²⁰三、隨著中國大陸深化「一帶一路」戰略，有討論提醒，應關注沿線國家可能因受經濟制裁，而影響到中國大陸的貿易、投資與戰略利益，經濟制裁作為非武力的政策選項，中國大陸應在法規與人才培訓上做積極因應（趙洲 2016, 114-119）。以下表一，就中國大陸內部對相關理論概

18. 基於明顯的商業需求與戰略動機、規模逐漸龐大的中國大陸對外援助，也被質疑可能對發展中國家帶來負面的政經影響。見Elizabeth Manero (2017)。

19. 主要是中國大陸對美元資產持有的增加、與中國大陸在美國境內存放資產的增多，中國大陸應進行分散化與多元化開放來減輕可能遭遇的壓力。

20. 事實上，中國大陸曾多次採用了單邊制裁的方式來達到政治目的，但在多邊國際經濟制裁，則較為謹慎、有選擇地參與。就制裁範圍與強度而言，中國大陸選擇性的制裁而非全面制裁，並多依賴貿易制裁或杯葛；隨著經濟援助與金融投資外交的增加，金融制裁自然可能成為潛用選項。見趙可金 (2011, 59-60)；閻梁 (2012, 26-29)。

念的認知、與實際應用性的探討，所作之歸納整理。

表一 中國大陸對經濟外交理論與應用的探討認知

	經濟外交主要概念	中國大陸經濟外交目的/ 手段措施
以政促經	外交手段或國家及其官員以干預方式、或透過國家經濟關係的發展，來協調修改經濟政策、應對經濟摩擦、促進國家經濟利益	1. 穩步外貿環境 2. 國內經濟轉型、資源市場需求進入 3. 全球治理
以經促政	通過配置經濟資源與相應手段，促成外交政治目標的實現，如雙多邊貿易協定、經濟援助、金融貨幣政策等，往往兼具促成政治與經濟目標的雙重作用	1. 和平崛起與大國周邊外交 2. 經濟資源或制裁逞戒影響政策與主權議題 3. 區域多邊規則的領導權
正面手段	正面性的利（Positive Inducement）意在改變施壓對象國的行為，往往政治與經濟目的兼具	1. 經貿關係擴展 2. 金融資本流通 3. 基建援助外交
負面手段	負面性（Negative Punishment）逞罰：貿易戰爭鍾多因經濟摩擦發生於貿易夥伴間的衝突；經濟制裁、經濟戰爭多為政治性目的，旨削弱施壓對象國的整體福祉，迫使該國政府改變政策行為	1. 物流貿易的限制 2. 金融資本的限制 3. 勞務人員流動的限制

資料來源：作者自繪（2018）。

肆、中國大陸于東南亞地區經濟外交開展概況

中國大陸對東南亞國家的經濟外交的展現與目的，便涵括前述的層次意涵。一方面追求雙方經濟利益的擴展互利、另一方面則希望營造穩定友好的週邊環境，為中國大陸的發展崛起創造和平環境、消除中國威脅論。最後，強化與東南亞國協（東協）相關區域組織外交平台的對接，有助穩固中國大陸進行大國外交、周邊外交的策略。本部分將關注近期（2007～2016年）中國大陸-東協國家間，于經貿投資數據、援建項目的發展概況、衍伸課題，進行分析探討。

一、中國大陸經濟外交的目的性：東南亞經濟與戰略地位的重要性與「以政促經」與「以經促政」的目的性需求

東協國家是中國大陸週邊最具發展潛力的地區，為中國大陸的持續增長、經濟轉型，提供廣潛的資源、市場。東協國家共有約6.22億人口、正在崛起的中產消費階層、有更為自由、成本更低的市場、豐富的自然資源與人才庫。中國大陸前總理溫家寶便於2006年在廣西南寧舉行的「中國與東協峰會」中便指出，東協除了是中國大陸工業發展重要的天然資源供應地，也為中國大陸的低價產品提供了約5億人口之巨大市場（鄧克禮 2016, 83-106）。

尤其中國大陸近年經濟走緩，但國民人均所得剛邁入中等收入階段；在人口紅利、環境保護要求提高、能否在經濟放緩之際因應充分就業等因素影響下，中國大陸正面臨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挑戰（王玉主、張蘊嶺 2017, 3）。在2015年中國大陸對外貿易下滑時，跨境電子商務逆勢上漲，交易額增長了21.7%，緩解了中國大陸企業的營運壓力，與東協跨境電商的發展也成為中國大陸後續經濟合作著力的項目（沈通 2017, 61；王玉主、張蘊嶺 2017, 3）。除了提供貿易、投資、市場、能源、糧食等需求，東協國家位處於重要航道的戰略位置，無論是中國大陸發展所賴的能源進口、貨物運送多由海路運輸，東南亞區域橫跨麻六甲海峽，也為美、日、韓等主要國家物資及貿易運輸的關鍵航道，是故東南亞國家之地理位置具有重要戰略與航道價值（鄧克禮 2016）。

又鑑於東協國家整合的加速，作為區域中心平台地位的提升，以及東協國家與世界經濟聯繫的深化，東協國家在政治外交政策的選項支持，自然對中國大陸的經濟發展與政治安全的影響大增。第一、中國大陸對東南亞採取積極經貿合作之餘、在經貿議題上先行讓利、主動提出與東協各國在「東協+1」的架構下磋商南海爭議磋商。這樣的方式，旨在彰顯中國大陸對東協機制的

支持（楊昊 2013, 13-20），也回應東協人士如馬凱碩等，對中國大陸企圖分化東協的批評，以符中國大陸的「和平」與「發展」的論述。第二、東協因領土、族群、宗教與經濟發展各異的因素下，發展所謂「東協模式」（The ASEAN Way）的漸進主義與「開放性區域主義」、降低對主權議題的涉入與約束，也符合中國大陸參與多邊主義時，強調以主權為尊、因地制宜符合發展需要的要求（邱坤玄 2010, 25）。第三，東協國家區域經濟一體化進程，已經由「10+3」擴展到「10+6」的「區域全面經濟夥伴協定」（RCEP），顯示區域國家對東協中心性的接受（王玉主、張蘊嶺 2017, 9）。而中國大陸對RCEP的談判推動自始積極，希冀透過強化與區域國家間，于經貿、技術與資源的整合，穩固中國大陸和東亞國家的政治經濟聯繫、外溢其影響力的拓展，並降低其他區域協議有排除中國大陸可能的壓力（呂冠頤 2018）。

二、經濟外交的手段措施

在2007年後，中國大陸與東協的經濟關係更有明顯遞增之勢。中國大陸對東南亞的貿易投資政策，主要是依託在以「東協+X」的多邊模式，包括中國東協自由貿易區（ACFTA）、中國東協自貿區升級版（ACFTA Plus）與區域全面經濟夥伴協議。而中共總書記習近平於2013年揭示的「一帶一路」，為一綜合性的經濟外交戰略，除了透過上述多邊自貿區協議的框架、在東南亞國家部分定點進行境外經濟區、產業區與工業區的規劃（謝琳燦 2016, 70-73）、降貿易壁壘實現貨物自由流通，屬於貿易外交；以交通運輸通道基礎建設的強化，是推動投資外交；以亞投行與中國東協海上合作基金的設立、增加人民幣作為國際結算貨幣，是為金融外交。這些措施顯示中國大陸經濟外交作為拓展國家對外戰略的工具性（任晶晶 2015, 111）。

（一）經貿投資外交

中國大陸前總理朱鎔基最早在2000年提出中國—東協自由貿易區構想，於2002年，中國大陸與東協簽署了《全面經濟合作框架協議》，2009年，與東協簽署《投資協議》正式確定於2010年成立區域多邊自由貿易區。²¹中國大陸簽訂ACFTA的考量，有經濟性，也有外交目的。除為後東亞金融危機，提供區域整合的條件外，也為中國大陸加入世貿，對東南亞國家的經濟發展帶來的不確定壓力，預作因應，達到其「睦鄰、安鄰、富鄰」的政策作為。2013年更開始動中國大陸—東協自貿區升級版談判，2015年11月，中國—東協自貿區升級協定》簽訂，完善原產地規則、擴大優惠關稅的產品範圍、簡化通關手續、加強技術轉移、減少匯率損失等便捷化措施，以期能增加雙方企業對自貿協議的使用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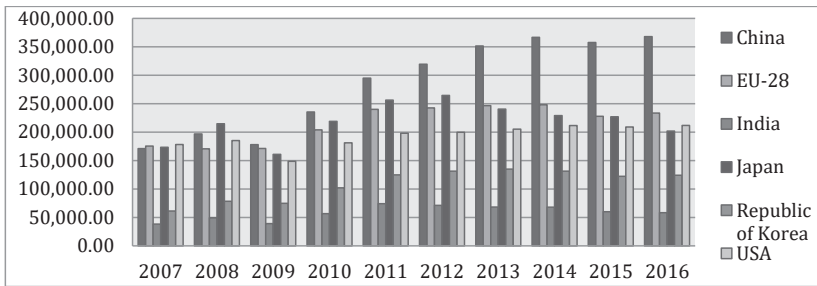
在2012~2013年，中國大陸全力支持由東協國家提出主導的《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在東協成員分與6個貿易夥伴已洽簽的5個「東協+1」的協定基礎上，擴展為「東協+6」，共計16個成員的巨型協議。RCEP最大的優勢，是亞太新興國家的納入參與，包含中國、印度、與東協，廣潛的成長動能、人口紅利，完成談判後，將形成人口約佔全球一半、全球貿易量達30%左右的自貿區。但RCEP若能完成，也能抵消美國佈局高規格的「跨太平洋夥伴協定」（TPP）帶來的開放壓力與政治衝擊。

在2010年1月ACFTA啟動後，雙方貿易與投資關係也發展迅速，圖一顯示，中國大陸自2010年前後開始成為東協國家的第一大

21. 2004年1月開始實施「早期收穫計劃」，開始對500多種產品實行降稅，到2008年他們的關稅將降到零。2004年，中國與東協簽署《貨物貿易協議》，而此協議的簽署正式啟動了CAFTA的建立過程。此外，雙方同年簽署了《爭端解決機制協議》。2007年1月，中國與東協簽署了《服務貿易協議》。中國承諾在WTO的開放條件下，進一步向東協各國開放運輸、環保、建築、體育和商務等5個服務部門中的26個分部門。東協10國也將向中國開放電信、教育、金融、建築、醫療及旅遊等行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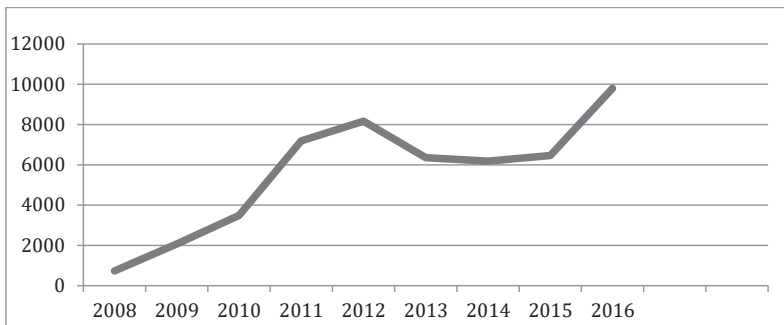
貿易夥伴，東協國家總體也在2015年前後，超越日本成為中國大陸第三大貿易夥伴。在投資方面，根據東協統計局數據整理後，如圖二顯示，2016年中國大陸對東協直接投資額大幅上昇為97.99 億美元，比比2015年增達50%，占該年東協來自各國直接投資的9.5%。

圖一 東協與主要國家貿易量走勢（以百萬美元計）



資料來源：作者自繪。資料整理自ASEAN Statistics Yearbook 2016-2017：<https://www.aseanstats.org/publication/asyb-2017/>（201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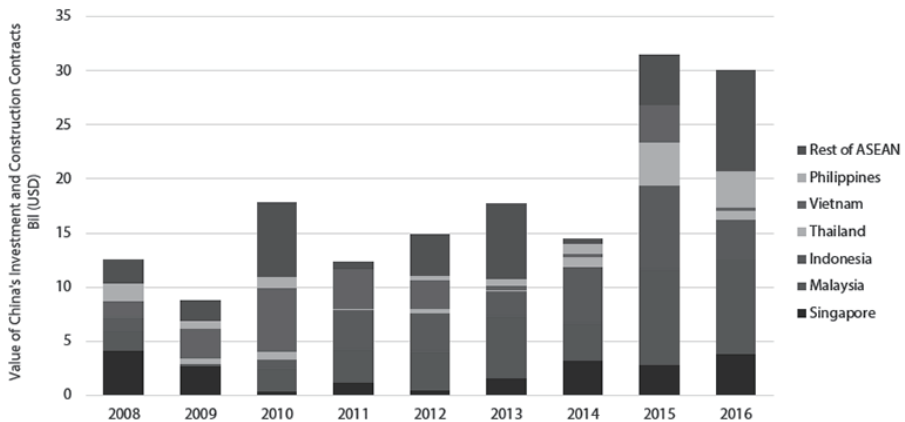
圖二 中國大陸對東協投資（以百萬美元計）



資料來源：作者自繪。資料整理自ASEAN Statistics Yearbook 2016-2017：<https://www.aseanstats.org/publication/asyb-2017/>（2018年）。

東協是中國大陸在國外投資和承包工程重要市場。截至2016年5月，中國大陸海外項目數量的地區分布，東南亞占了22%。以國家區分，以印尼項目數最多，有35個；從投資規模來看，中國大陸投資馬來西亞金額最高，為590億美元（ASEAN Secretariat 2017；吳佳勳、劉孟俊 2016, 3-5）。中國大陸對個別東協國家的投資，過去多集中于半島國家，如新加坡、緬甸、寮國、柬埔寨等國家，在2013年後，更多投資往經濟實力強的國家，如印尼、泰國、馬來西亞，除菲律賓歷年來所占比重較小外（但2016年有顯著提升）。尤其近年，中國大陸對印尼、馬來西亞投資的成長最快，而新加坡為東南亞發展最高的國家，相對穩定地吸引來自中國大陸到的投資（參見圖三）。

圖三 中國大陸對東協投資與工程包案金額（以十億美元計）



Source: 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 and the Heritage Foundation, ANZ 2017

資料來源：節錄自Edward Ng, October 5th, 2017, The Rise of Chinese FDI into ASEAN <https://en.nikkoam.com/articles/2017/10/the-rise-of-chinese-fdi-into-asean> (2018)。

在2015年時，中國對該區域直接投資量創歷史新高，首次達到146.4億美元，占「一帶一路」相關區域投資量的比例為

77.24%，顯見東協國家是中國大陸大陸企業對外投資的重要目的地，也是「一帶一路」建設的重點（宋鎮照 2017）。

（二）金融援建外交

中國大陸對東南亞的金融援助合作，也是呈穩步上昇的常態化。2010年至2012年，中國共向121個國家提供了援助，同時按照地區與資金劃分比例，非洲地區占了金額的51.8%，次為亞洲地區，占了30.5%。兩地之和就占了約達85%之譜。中國大陸早期對東南亞的援助集中支持中南半島的社會主義國家，冷戰後開始擴及到東南亞整個地區。其中較普遍的形式，是物資與人道援助、與工程建設的協助，項目也逐漸多元化。²²但一般認為中國大陸的援助問題，是資金來源過於單一，民間自主援助貢獻比重不大，易使當地政府擔心有政治滲透的疑慮，認為有過重的政治與經濟意圖，人道主義的考量表現不足（魏涵 2014, 79-80）。

中國大陸也認知到金融外交對國家社會生活的影響力。在東亞金融危機後，開始積極參與推動地區與國際的金融合作。在東南亞地區的金融合作，主要是針對人民幣國際化與人民幣匯率的課題。在2000年中國大陸向東協提出籌建自貿區，于2003年透過「東協+3」的對話機制下的「清邁協議」，與東亞國家簽訂了數個雙邊貨幣互換協議。同時在邊境貿易中，與越南、泰國等國開始以人民幣貨幣結算。

2014年10月中國大陸推動成立「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由中國大陸出資1000億美元，目標在投資亞洲地區的公路、鐵路建設、發電廠與電信網絡等。另外出資400億美元，成立「絲路基金」向「一帶路」沿線國家在基礎建設、資源開發與金融產業合作等項目，提供合作支持。而早前于此，中國大陸在2011年時，前總

22. 譬如中國大陸於2004年印尼海嘯災害，提供了6.9億美元的物資捐助；在2008年緬甸遭受熱帶風暴襲擊，捐助了超過3000萬美元的物資。

理溫家寶出席東協領袖高峰會時，便提議出資30億美元成立中國大陸東協海上合作基金。習近平于2013年10月在印尼的國會演講，揭示要促成「海上絲綢之路」的構想，此合作基金的發展或將更備受重視。但海上合作基金的設立，目的更偏重于政治互信與戰略安全的建立，旨在成為推動落實《南海各方行為宣言》（DOC）的示範基金，透過在海洋科研與環保、海上基礎設施的建造、強化區域海上安全，如在航行安全與搜救以及打擊海上跨國犯罪等領域的合作（康霖、羅亮 2014, 27-36）。

中國大陸經濟外交的另一個重點領域，是在重要基礎設施的建造，所謂推動中國大陸與週邊國家的「互聯互通」。²³其中高鐵的興建成為中共十八大後的主要推廣項目，對高鐵興建的參與，在東南亞地區尤其頻繁。中國大陸籌劃建構中國大陸-東協高鐵網，修建貫穿越南、寮國、緬甸、柬埔寨、泰國、馬來西亞和新加坡的區域高鐵網，起點皆由雲南昆明出發，分東線、中線和西線三條線路，三條線路皆經泰國曼谷延伸至新加坡，構成著名的「泛亞鐵路」網，估計總投資將超過20億美元（見圖四）。中國大陸另向印尼提出興建印尼雅加達至萬隆高速鐵路（雅萬高鐵）由中國大陸和印尼的國企聯合共同建設。目前，泛亞鐵路中跨境的中泰鐵路線在2017年12月正式動工，中印合作的雅萬鐵路在2016年8月正式取得全線建設許可證。相關鐵路線的建設倘若完成，可增加中國大陸與東協于農產品、商品和能源銷售，而中國大陸也降低了海路運輸需繞道麻六甲海峽的成本與風險，並增加對東南亞地區的政治影響力。

另外一個大型穿貫東南亞的區域計畫，是在電力電網的合作輸送，並與原有的「大湄公河計畫」下的電網進行互通。主要可分

23. 包括公路、鐵路、港口、橋梁、航空、石油管道、電力、電信等基礎設施的建設完善，來完成此一戰略核心。

為三大部分：一部分是緬北及寮國北部大型水電，在伊洛瓦底江上游進行2,000萬千瓦的水電開發規模，優先留存於緬甸，其餘輸送到附近的雲南使用。二、另一部分是在薩爾溫江上游約500萬千瓦，先留存緬甸所需的電力為先，其餘電力就近輸往雲南。最後，在薩爾溫江中游、湄公河等流域，將有1,500萬千瓦的電力開發，優先輸送到緬甸和寮國，其餘分送到泰國和中國大陸。而中國大陸可能利用其在資金、人員、工程技術的優勢，來進行電網建設與電力貿易平台的興建（宋鎮照 2014）。

圖四 泛亞鐵路路線示意圖



資料來源：節錄自新浪網，2014年，〈泰國批准高鐵直通中國〉，8月3日。
<https://m.hfurter.com/informationdetail/252> (2018年)。

三、經濟制裁：可能性的增加

中國大陸近年來的外交實踐，也開始採用經濟制裁的手段，尤其以單邊行為來達到使外交對手政治讓步的目的。方式上以貿易制裁、杯葛抵制、旅遊限制為主，但也逐步走向多元化，甚至是金融信貸、企業與個人的限制。主要對象除了是針對美歐國家在貿易摩擦、人權干涉、與對台軍售等議題上的施壓，東亞國家更成為近期受中國大陸制裁壓力的主要對象，屢見不少案例。

對歐美國家制裁的案例，除針對美國在貿易雙反（反補貼傾銷）稅議題上實行反制裁，中國大陸在2010、2015年就美國歐巴馬政府軍售台灣，曾對參與軍售的美國公司發出制裁警告。尤其2010年是首次釋出明確警告，但未具體執行。在2008-2009間，針對達賴喇嘛于2008年12月訪問法國，中國大陸威脅對法國進行制裁，取消或延遲對法國空中巴士客機的部分訂單。2010年因劉曉波獲頒諾貝爾和平獎，中國大陸取消與挪威進行自貿協議的談判，並減少近70%自挪威進口的鮭魚，直到近年雙方關係才漸恢復正常（Reilly 2012, 121-133）。

針對東亞國家的制裁，主要是因領土與安全議題而起的爭端。在2007~2008年曾威脅制裁英國石油（BP）、美孚石油（Exxon Mobile）公司，就其與越南國企在爭端南海海域，進行石油的合資開採。2010年，中日兩國因釣魚台島關係趨於緊張，9月份開始，中國大陸限制稀土出口到日本，並限制日本消費性電子產品的進口數量與價格，並出現有中國大陸民眾抵制購買日本產品的現象。而在2012年5月美國、歐盟、日本就中國稀土出口向世界貿易組織提出仲裁要求。中國大陸以保護稀有資源與環境、人民健康安全，對稀土出口進行管制。近日，在中美貿易摩擦升高之際，因中國大陸稀土產量高，且含高質量稀有金屬，被認為可能成為反制美國貿易壓力的政策工具。

其他近期的東亞制裁案例，包括2012年4月在黃岩島海域，因菲律賓海軍欲拘捕進入南海黃岩島捕魚的中國大陸漁船，造成中菲在海上的對峙。中國大陸後限制菲律賓香蕉、芒果、與木瓜的進口，中國大陸也限制到菲律賓旅遊的遊客人次，影響當地香蕉與旅遊業的收益（魏涵 2014, 80）。在2016年底，為表達對南韓部署薩德系統的強烈不滿，中國大陸政府對韓國進行經濟制裁，有所謂不成文的「限韓令」出現，表現在禁止韓星赴中表演、限制韓劇播放，抵制韓貨，以及抵制樂天集團，減少韓資企業補貼、加強其稅務調查等。其中樂天超市在中國大陸市場營運因此而受影響，在2017年9月，達87家超市被迫停業，並傳出樂天將出售中國大陸超市業務。隨著中國大陸經濟實力、全球利益與國際影響力的提升，有觀察認為，在中共十九大召開後，經濟制裁可能成為中國大陸開展對外關係的重要手段（劉孟俊、謝頌遇 2017, 13）。

伍、東南亞國家回應與中國經濟外交的有限性

多數東協國家對中國大陸的經濟外交，多持正面回應。畢竟經貿關係的拓展，亦有助於東協國家的自身發展，或也可視為，東協國家正對中國大陸採取「經濟外交」策略。但面對中國大陸經濟的持續崛起，及其經濟外交全面性的拓展，也有越多來自東協國家內部團體、政策精英對中國大陸產生的經濟依賴，對東協可能的經濟與政治安全的影響，有所質疑，甚有傾向採取牽制的措施。

一、「以政促經」面臨的限制：東協國家對經濟安全的考量與內部政治社會團體力量的牽制

影響中國大陸與東協經濟深化的限制因素主要有下：第一、中國大陸經濟崛起、對中依賴的增加，對東協國家經濟影響的疑慮增加。對東南亞國家經濟與產業發展影響的討論，可分為兩方面。

一是經濟發展程度較高、市場較大的東南亞國家，擔心與中國大陸順差的擴大、對外資與技術的競爭；另一個是經貿關係高度仰賴中國大陸市場與投資，卻可能過多集中于附加產值較低的農產品、自然資源、大型基礎工程等項目，或不利東協國產業的提升與出口的成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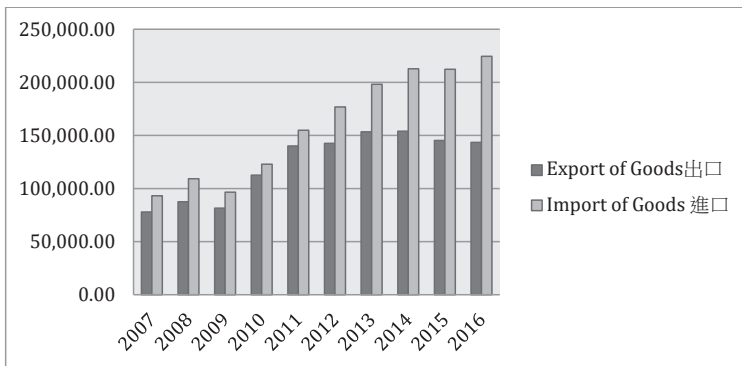
譬如在2010年中國大陸東協自貿區啟動後，自2011年，東協對中國大陸開始出現逆差。在2012~2015年間，東協國家對中國大陸的逆差額快速上昇。由2012年的逆差額為112億美元，上昇到2015年逆差額828億美元，4年間貿易逆差擴大了近8倍。東協一些國家對中國大陸近年來保持順差且差額不斷加大表示不滿和擔憂，認為中國大陸是中國大陸-東協自貿區的真正受害者。²⁴主要國家包括印尼、泰國、越南對中國大陸的逆差都有擴大趨勢。如圖表五所示，東協方的統計也顯示，自2011年以後，東協國家對中國大陸的出口，居然有下滑趨勢，但同期來自中國大陸的進口卻走向漲幅，使得對中國大陸的貿易逆差額有上揚趨勢。

同時，也因為全球經濟景氣復蘇的緩慢，中國大陸與東協的貿易額與投資額在2014年後呈現增速走緩的現象。譬如在2015年雙邊貿易額並未達到設定的5000億美元目標，之後反而有下降走緩的趨勢（王玉主、張蘊嶺 2017, 12-13）。同時，根據東協學者的統計研究，對東協直接投資的經濟回報率，美歐國家為主的經濟與合

24. 有研究指出，自貿區建立後，中國機電產品質優價廉的優勢更加凸顯，而中國企業對東協加大了投資，多數集中于大型工程項目的投資，卻加大了東協從中國進口大型設備的需求，使得中國大陸迅速取代日本，成為東協大型設備進口的第一大來源國，也加大逆差額度，見徐步、張博（2017, 17-18）。又如越南在2016年開始，成為東協國家中，中國大陸最大的貿易夥伴。但自2006年開始，越南對中國大陸的貿易逆差變逐年加大，尤其在2015年ACFTA 實施零關稅時，越南便擔心中國大陸機電與較高技術產品的輸入，使越南加深對中國大陸在廉價產品、技術、與資金投資的仰賴。見張雅君（2017, 45-97）。

作組織（OECD）在東協國家的投資回報率是60%，但中國大陸的回報率只約15%，可見中國大陸對東協國家投資的效率和質量不高（顏潔 2017, 3-7）。

圖五 東協對中國大陸進出口變化：2007～2016（以百萬美元計）



資料來源：作者自繪。資料整理自ASEAN Statistics Yearbook 2016-2017：
<https://www.aseanstats.org/publication/asyb-2017/>（2018）。

在大型區域協議RCEP的推動，也遇到談判障礙。自2013年開始，RCEP便進入談判，原定2015年內完成協議，談判卻屢陷膠著，數次展延完成年度。主要是中印等國對關稅、非關稅自由化與規則高標化的保守態度。印度與部分東協國家因對中國大陸存在貿易逆差，對降低貨物關稅至90%～95%水準的覆蓋率有所保留。而日本、澳洲、新加坡等國，則希望推進更高標準規則磋商、與非關稅障礙的降低。尤其日本、澳洲重視企業的自由活動、對智慧財產權的保障，與中國大陸在互聯網空間的限制管理、對法規制定與智財保護上主張放寬規則、對外企投資的限制、要求公開軟體內容等重要項目，存在意見分歧（呂冠頤 2018）。

第二、中國大陸經貿外交的拓展，也面臨東協國家內部團體的質疑。一個是中國大陸投資對當地環境與社會的可能負面影響，造成當地民間團體的反彈；另一個是不同政治團體對當地政府，批准中國大陸大型投資項目決策透明度的質疑。此外，當地政府統治的不穩定，或因族群與宗教因素，造成政府政策轉向，而叫停與中國大陸的經貿投資合作。中國大陸尤其擔心伊斯蘭極端勢力抬頭，對中國大陸與東協合作項目帶來的可能障礙。

以相對依賴中國大陸援助與投資的緬甸為例。中國大陸大量經濟資源的投入，使當地居民與團體對中資企業帶來的環境汙染、不當土地取得、勞工剝削等產生不滿。到了2011年，登盛政府暫緩中國大陸高達36億美元投資的密松大壩案，使中緬關係進入不確定時期。²⁵2013年，緬甸當地團體抨擊中緬原油管道和中緬天然氣管道的興建，該項目為一帶一路戰略的一部份，由中國石油天然氣集團公司（中石油）和緬甸油氣公司合資建設。但在2013年開始，受到緬甸內部團體組織的批評，並認為有貪污之嫌。中緬原油管道2015年1月被迫閒置關閉到2017年中，才開始重新輸氣。相類似的情況也發生在越南，例如越南內部對中國大陸在湄公河上游興建修築14個水壩，對處於湄公河下游終端的越南，造成環境、水源、與發電的壓力，嚴重影響越南湄公河沿岸稻米、魚類生長的生態環境，內部反對聲浪極大。截流發電造成越南境內湄公河水位降至低點，于2016年3月，甚至發生百年來最嚴重旱患。甚至有湄公河維權分子，認為中國大陸以控制河流與水源作為掌控中南半島的外交談判籌碼。另有越南研究評估，越南在貿易甚至電力、水力上對中國大陸的依賴，可使中國大陸以禁運方式，將導致越南國民生產毛

25. 中國大陸在1988年開始成為緬甸最大投資國，並大舉投資石油、天然氣、與礦產等產業，並成為緬甸軍事武器的主要供應國、並在緬甸沿岸部署運輸通訊設備，以緬甸作為通往孟加拉灣、印度洋與麻六甲海峽的要道。見林份靜（2017, 105-140）；BBC中文網（2017）。

額縮水達10~15%（張雅君 2017,45-97；ETtoday 新聞雲 2017）。

在馬來西亞，總理納吉在2016年底訪問中國大陸，簽署了14項總值約320億美元的合作備忘錄，為馬國歷來與外國簽署的最大投資項。但馬上受到反對黨希望聯盟與土著團結黨陣營的抨擊，尤其在國營企業一馬公司醜聞的發酵下，批判納吉與國陣聯盟支持通過的中資項目，是企圖為納吉做政治解套。而在2018年5月舉行馬來西亞國會選舉前，代表反對黨陣營希望聯盟首相人選的前強人總理馬哈迪便公開表示，勝選將重新審視中資投資方案，認為某些重大的中資方案僅提供中方公司在馬來西亞的營運，沒有惠及馬來西亞當地的就業、公司、與技術轉移；抨擊納吉決策的不透明，且未公開相關資訊與文件（Bloomberg, 2018）。尤其中國大陸地產商到馬來西亞的大量投資計劃，也引發是否造成馬來西亞當地物業過剩、中國大陸買家與中籍移工移入等爭議。²⁶

而在中國大陸政府積極推動的高鐵項目，除了中泰鐵路跨境段進行正式動工，與新馬跨境鐵路段，因未直接與中國大陸邊境接壤，國安疑慮小，已進行招標工程外，其他主要路段仍面臨推進障礙。即便中泰鐵路在2014年12月就簽署了備忘錄，中間仍經過多次協議，且因融資、沿線開發權、環評等問題發生分歧，經過廿次的密集談判，最終在2017年9月才簽署設計和監理合同，在2018年初開始正式動工。而其他境外項目，則發展不甚順利。譬如在中緬高鐵建設項目上，雙方在2011年雙方簽署備忘錄，緬甸卻似乎採取了拖延策略，到了2014年，合作備忘錄期限將至時，卻在2014年3月，日本政府宣布將無償援助緬甸78億元幫助修建鐵路設施。在中越跨境接壤的泛亞鐵路路段，工程尚未有實質進展。換言之，泛亞鐵路目前，僅有在中線的部分路段較有進展。而印尼雅萬鐵路線，

26. 最知名的案例便是由中國大陸碧桂園和馬來西亞柔佛州的人民基建集團，預計斥資1000億美元，于近新加坡、麻六甲海峽海峽的馬來西亞南部新山市，實行人工造島造市鎮的「森林城市」，以廣售中國大陸房客為主、佔地20平方公里的巨型地產計劃。

除了是印尼的第一條高鐵，印尼更是被中國大陸政府認為是推進一步一路的戰略重點國。雅萬鐵路預計耗資55億美元，由中印兩國企業合作興建，75%費用將由中國大陸國家開發銀行提供貸款。在2016年1月得到動工許可，中方僅動工一周便面臨停工，原因是部分路段的土地徵收與環評仍在進行中，預計項目完成時間將推遲至2020年底（聯合報 2018）。

「一帶一路」自計劃提出以來，就迅速展開資金與援助的大量投入。到2017年初，大陸國家開發銀行和進出口銀行在「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及地區的貸款餘額已達2,000億美元。僅2016年，該行在「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發放貸款規模達235億美元，比2015年增長35.8%。但實際在境外所看到的具體成果卻相對有限，也使得習近平直接呼籲要「實施好一批示範性項目」。主要原因常是資金往往未能到位，或因當地政治社會因素使基礎建設的設計與出資談判陷入膠著。當地國家政治與經濟風險的提升，反映在中國大陸對「一帶一路」沿線國投資的放緩，在2016年，對53個「一帶一路」國家的對外直接投資總計為145億美元，只占大陸全部對外投資的9%；中國大陸對「一帶一路」國家的對外直接投資在2016年下降2%，在2017年前3個月同比下降18%（傅豐誠 2017）。許多中國大陸學者也認為中國大陸內部協調不一，與其企業對貿易自由化規則的缺乏理解，可能推高海外基礎設施的建設與營運成本（何茂春、張冀兵、張雅芃、田斌 2015, 36-45）。

二、「以經促政」面臨的限制：東協國家避險 - 等距外交策略的運用

中國大陸「以經促政」的限制，主要是中國大陸是否能有效將經濟影響力轉化成對東協國家的政治影響力，或經濟合作能否外溢到政治互信的促進、主權問題的解決，都依然有待觀察。這主要

受東協內部與外部國家戰略選項的互動所影響。就東協內部而言，東協國家在國安認知與主權安全議題尚未解決的情勢下，與中國大陸經濟關係的深化依賴，加大了東協國家的憂慮，擔心中國大陸以經濟外交措施迫使其在安全核心議題的讓步。

是故，東協國家多力持平衡、避險外交戰略路線，主要表現在如下幾面向。第一、經濟上增加對中國大陸的合作，但在軍事上傾向倚靠美國。這體現于與美國和其他亞太國家在軍事交流、聯演的合作，或增加軍費預算（Goh 2016）。新加坡前資政李光耀在2009年10月，公開表示歡迎美國在東亞發揮影響力，以平衡中國大陸在地區政經影響力；而新加坡也對中國大陸的「一帶一路」回應相對冷淡，擔憂影響新國在麻六甲海峽的戰略地位，新國總理李顯龍也未出席2017年5月舉行的「一帶一路高峰論壇」。即便是菲律賓總統杜特蒂上任後，被認為其立場轉向「遠美親中」，在其主政下，菲律賓仍依據2014年美菲簽署的《加強防務合作協議》，允許美軍駐菲，並新修5個軍事基地。更有傳出，菲律賓內部熟習外交安全事務決策人士，對杜特蒂總統在南海議題（菲律賓海）政策過於退讓的不滿（Leu 2018）。印尼、越南近年也尋求與美國在南海海域進行軍演。印尼更在2009年以後，大幅增加軍備支出，似有維繫其東南亞海權大國的地位之舉。針對東南亞國家政策的兩面性，有中國大陸學者認為，這是東協國家一種「戰略性疏遠」中國大陸的策略，目的不見得是制衡對抗中國大陸，但以適度政治摩擦來避免經濟快速走向過度依賴，同時確保核心利益的立場（王玉主 2016, 1-11）。

第二、東協採取更開放多元化的投資貿易環境，積極與世界各國和企業建立經貿聯繫，降低可能對單一國家、或中國大陸經濟產生的不對稱依賴。東協國家不僅以東協模式與亞太區域國家簽訂自貿協議，也與歐洲、加拿大簽署自貿區協定，與印度、俄羅斯、

美國建立戰略夥伴關係。在美國退出TPP情形下，原有TPP的11個成員國（含新加坡、馬來西亞、越南、汶萊等東協成員），在2018年3月8日，通過了「跨太平洋夥伴全面進展協定」（CPTPP）。在CPTPP剛通過不久，泰國在4月24日，表示將加入CPTPP，成為11個原始國外的第一個新會員，印尼也正研擬加入，並將鼓勵其他東協成員加入。此外，至2017年4月，東協有關委員會已在全球50個國家設立代表處，並有近90個國家任命駐東協大使，²⁷是全方位的「引進來」、「走出去」戰略。

第三、是加速東協國家彼此的整合，強化東協中心性與一致性。在2002~2005年間，東協快速地分別與中國大陸、日本、韓國簽訂自由貿易協定，一來持續強化東協成員國的經濟聯繫，二來藉開放多元貿易投資聯繫，來強化與區域大國經濟對接的機會（Leu 2011, 31-64）。東協國家的策略、其整體經濟與戰略地位的提升，也吸引美國、日本、歐洲與其他近鄰如韓國、台灣、印度、澳洲等強化與東南亞國家的關係。根據東協秘書處在2016年公佈的《東協統計年鑑》，除了2016年中國大陸對東協投資比重有大幅成長外，在2013~2015年間，多維持在5%左右。長期而言，若按國別，對東協投資排名前六位的國家和地區，分別為歐盟、日本、美國、中國大陸、韓國和澳洲；2016年流入東協的投資淨值，除了歐盟占31.1%，東協各國占23.3%，美國、日本和中國大陸對東協的投資額分列前三名，各占東協外資總額的11.8%、11.1%和9.4%，除顯示東協對外經貿關係的均衡發展，也是其他國家對東南亞市場的同

27. 又如東協在2003年領袖會議中通過《峇里第二協約》（Bali Concord II）宣示推動東協共同體的成立；東協更在2007年通過《東協憲章》（ASEAN Charter），欲將東協轉化成更正式有約束力的國際組織。2016年東協經濟共同體（AEC）正式成立上路。無論是東協共同體的成立，與正在實施《2025年東協共同體願景》、《東協經濟共同體發展藍圖2025》、《東協互聯互通總體規劃2025》等協議都在強化彼此經貿、投資、甚至是產業與人才的聯繫。見宋鎮照（2017）。

airiti
步重視。²⁸

如此策略強調的是，唯有東協國家間協調能力的強化，才能在面對中國大陸的「一帶一路」或其他各種倡議時，免受被分化、邊緣的困境，並強化東協的自主性地位（Ba 2016, 1-4）。更有如東南亞地區的學者專家Kuik Chew-Cheng認為，在面對中國大陸經濟與外交的崛起，與美國川普總統退出TPP後、採取「美國優先」政策，可能使部分東協成員國受限於中國大陸經濟外交，從戰略模糊走向戰略明確的政策，不是過分傾中便是過度親美，將弱化東南亞國家的避險策略與作為區域權力平衡的角色，反鼓勵區域大國採取冒進危險的策略，將有危亞太的和平安全（Kuik 2018）。

陸、結論

中國大陸與東協國家間經貿關係增長快速，顯見於次區域間貿易量的成長、投資金額的擴大，與雙多邊經濟合作協議的開展。而近年中國大陸積極的經濟外交作為更是主要的推動力，順應東協國家經濟與區域戰略地位的提升，藉多層次經濟外交的合作，強化中國大陸的週邊安全與經濟安全、促成政治戰略性目的。中國大陸對東協國家的經貿外交戰略可約略歸諸於以下層面：經貿投資上多以雙邊、多邊進行、順應「東協+x」的「東協中心性」模式，在金融援建議題上，更傾以具單邊主導性的倡議，分別與一或數個東協國家進行投資或基建設施的合作。除了正向性經貿的合作，經濟制裁也可能成為中國大陸開展對外關係的手段措施。

分析東協國家的相應回應，論者多以為東協國家整體採行

28. 雖然中國大陸在東協的投資逐年增加，但相比他國，在2006至2017年，歐盟、東協內部相互投資、日本、美國分居投資前四名，中國大陸在2015-2017年度投資上昇大，但在總存量（Stock）上相比他國，依然有一定的差距，參見ASEAN Statistics Yearbook 2016-2017（ASEAN Secretariat 2017）。

「經濟向中、軍事向美」的兩面下注或避險策略，但分析東協國家與中國大陸加大經濟合作的過程中，也反映著如下走勢。一是東協國家內部對中經濟關係的增幅擴大，仍持謹慎態度或甚有檢討聲浪（李瓊莉 2015, 71-113）。二是其經貿投資策略，持續「多元化開放」、同步強化「東協中心性」的策略，與區域其他國加強經貿關係，避免過度集中依賴產生安全外溢性（Kuik 2008；鄧克禮 2016）。

在中國大陸與其他區域國家紛向東南亞國家展開經濟外交舉措之際，除突顯東南亞國家作為重要經濟與戰略樞紐的區域性地位外，也應妥善理解東南亞當地國的政治經濟環境與發展需求，才能有助於經貿關係朝向建設性發展，避免政治風險與經濟摩擦的激化。同時，在各項倡議並呈之際，東協國家能否持續區域中介角色的維持，強化東協中心性，使東南亞國家不過分依賴特定強國和集團，不僅有利東協國家的利益與獨立外交政策的確保、也將影響區域的權力平衡與和平穩定。

參考文獻

一、中文

- 人民網，2004，〈溫家寶：推動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外交上一個新水準〉，<http://www.people.com.cn/GB/shizheng/1024/2756839.html>，查閱時間：2018/03/24。People's Daily. 2004. "Wen Jiabao: tuidong fazhanzhong guojia de jingji waijiao shang yige xin shuiping" [Wen Jiabao: A New Standard in Promoting the Economies and Foreign Affairs of Developing Countries]. (Accessed on March 24, 2018).
- 中國外交部，2014，〈盤點2014：中國外交豐收之年〉，<http://www.mfa.gov.cn/chn/gxh/zlb/ldzyjh/t1222375.htm>，查閱時間：2018/03/24。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2014. "Pandian 2014: Zhongguo waijiao fengshou zhi nian" [Taking Inventory 2014: A Bumper Year in China's Foreign Affairs]. (Accessed on March 24, 2018).
- 中國商務部，2017，〈中美貿易依存度一升一降〉，<http://coi.mofcom.gov.cn/article/t/201708/20170802629088.shtml>，查閱時間：2018/03/24。Ministry of Commerce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2017. "Zhongmei maoyi yicundu yishengyijiang" [Ups and Downs in Sino-American Trading Dependence]. (Accessed on March 24, 2018).
- 中國大陸國務院新聞辦公室，2014，〈中國的對外援助2014年白皮書（2014年）〉，http://www.gov.cn/zhengce/2014-07/10/content_2715467.htm，查閱時間：2018/03/24。State Council Information Office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2014. "Zhongguo de duiwai yuanzhu 2014 nian baipishu (2014 nian)" [2014 White Paper on China's Aid to Foreign Countries]. (Accessed on March 24, 2018).
- 王玉主，2016，〈東盟崛起背景下的中國東盟關係—自我認知變化與對外戰略調整〉，《南洋問題研究》，（2）：1-11。Wang, Yu-zhu. 2016. "Dongmeng jueqi beijing xia de zhongguo dongmeng guanxi—ziwo renzhi bianhua yu duiwai zhanlue tiaozheng" [The China-ASEAN Relationship under the Rise of ASEAN: Changes in Self-Awareness and Foreign Strategy Adjustments]. *Fujian: Southeast Asian Affairs* (2): 1-11.
- 王玉主、張蘊嶺，2017，〈中國發展戰略與中國—東盟關係再認識〉，《東南亞研究》，（6）：1-15。Wang, Yu-zhu, Zhang, Yunling. 2017. "Zhongguo fazhan zhanlue yu zhongguo-dongmeng guanxi zai renshi" [The Rediscovering the China-ASEAN Relationship under China's Development

Strategy]. *Guangzhou: Journal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6): 1-15.

- 王棟梁，2016，〈中國對東南亞的經濟外交分析〉，《商》，(11)：130。
Wang, Dongliang. “Zhongguo due dongnanya de jingji waijiao fenxi” [Analysis of China’s Economic and Foreign Affairs toward Southeast Asia]. *Sichuan: Business* (11): 130.
- 王宏鑫，2016，〈國際法視野下美國當前對華經濟制裁可能性分析〉，《法制與經濟》，9：42-45。Wang, Hongxin. 2016. “Guojifa shiye xia meigu dangqian duihua jingji zhicai kenengxing fenxi” [Analysis of the Possibility of for American Economic Sanctions on China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ternational Law]. *Guangxi: Legal and Economy* 9: 42-45.
- 王簫軻、張慧智，2015，〈大國競爭與中國對東南亞的經濟外交〉，《東南亞研究》，(1)：27-32。Wang, Xiaoke and Huizhi Zhang. 2015. “Daguo jingzheng yu zhongguo dui dongnanya de jingji waijiao” [Competition of Great Powers and China’s Economic Diplomacy toward Southeast Asia]. *Guangdong: Journal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1): 27-32.
- 田春生，2014，〈關於經濟外交中經濟利益因素的梳理及述評〉，《深圳大學學報》，34(2)：287-93。Tian, Chunsheng. 2014. “Guanyu jingji waijiao zhong jingji liyi yinsu de shuli ji shuping” [Arranging and Discussing Factors of Economic Interest within Economic Diplomacy]. *Guangzhou: Journal of Humanities Social Science* 34 (2): 87-93.
- 任晶晶，2015，〈一帶一路背景下中國經濟外交的戰略轉型〉，《新視野》，(6)：106-111。Ren, Jing-jing. 2015. “Yidai yilu beijing xia zhongguo jingji waijiao de zhanlue zhuanxing” [Strategic Transition in China’s Economic Diplomacy under One Belt One Road]. *Beijing: Expanding Horizons* (6): 106-111.
- 江瑞平，2009，〈當前中國經濟外交面臨的機遇與挑戰〉，《外交評論》，(5)：40-55。Jiang, Ruiping. 2009. “Dangqian zhongguo jingji waijiao mianlin de jiyu yu tiaozhan”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Faced by China’s Current Economic Diplomacy]. *Beijing: Foreign Affairs Review* 2009 (5): 40-55.
- 何茂春，2012，〈經濟外交面臨新課題〉，《中國報導》，105：22-23。He, Maochun. 2012. “Jingji waijiao mianlin xin keti” [Economic Diplomacy Faces New Challenges]. *Beijing: China Repor* 105: 22-23.
- 何茂春、張冀兵、張雅芃、田斌，2015，〈一帶一路戰略面臨的障礙與對策〉，《新疆師範大學學報》，36(3)：36-45。He, Maochun, Jibing Zhang, Yapeng Zhang, and Bin Tien. 2015. “Yidai yilu zhanlue mianlin de zhang’ai yu duice” [Obstacles and Countermeasures in the One Belt One Road

Initiative]. *Xinjiang: Journal of Xinjiang Normal University* 36 (3): 36-45.

吳佳勳、劉孟俊，2016，〈中國「一帶一路」倡議在東協的經貿布局與挑戰〉，東協經貿與外資的發展研討會，台北：台灣大學。Wu, Jiaxun, Mengjiun Liu. 2016. “Zhongguo ‘yidai yilu’ changyi zai dongxie de jingmao buju yu tiaozhan” [Arrangements and Challenges for Trade under China’s ‘One Belt One Road’ Initiative in Southeast Asia]. Paper presented at the Trade an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Of ASEAN Symposium. Taipei: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宋鎮照，2014，〈一帶一路絲綢經濟跨區域戰略下中國與東南亞的關係發展：機會與挑戰〉，http://140.119.184.164/view_pdf/193.pdf，查閱時間：2018/03/24。Soong, Jenn-jaw. 2014. “Yidai yilu sichou jingji kuaquyu zhanlue xia zhongguo yu dongnanya de guanxi fazhan” [Development of the China-Southeast Asian relationship Under One Belt One Road Silk the Silk Road Economic Belt region: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Accessed on March 24, 2018).

宋鎮照，2017，〈一帶一路與東協發展的連結和對接機會〉，《海峽評論》，319：13-18。Soong, Jenn-jaw. 2014. “Yidai yilu yu dongxie fazhan de lianjie han duijie jihui” [Links and Opportunities for One Belt One Road and ASEAN Development]. *Taipei: Cross Strait Review* 319: 13-18.

李先靈，2015，〈習近平總書記的經濟安全觀〉，《政治經濟學評論》，6（5），頁152-162。Li Xianling. 2015. “Xi Jinping zongshuji de jingji anquan guan” [The Economic and Security views of General Secretary Xi Jinping]. *Beijing: Review of Political Economy* 6 (5): 152-162.

李瓊莉，2015，〈亞太區域經濟構築中的「東協中心性」〉，《遠景基金會季刊》，16（4）：71-113。Lee, Chyung-ly. 2015. “Yatai quyu jingji gouzhu zhong de ‘dongxie’ zhongxin xing” [“ASEAN Centrality” in Asia-Pacific Regional Economic Architecture]. *Taipei: Prospect Quarterly* 16 (4): 71-113.

李巍、孫憶，2014，〈理解中國經濟外交〉，《外交評論》，4：1-24。Li, Wei, Yi Sun. 2014. “Lijie zhongguo jingji waijiao” [Understanding China’s Economic Diplomacy]. *Beijing: Foreign Affairs Review* 4: 1-24.

沈通，2017，〈一帶一路戰略背景下中國—東盟地區經濟發展的思考〉，《現代商業》，8：60-61。Shen, Dong. 2017. “Yidai yilu zhanlue beijing xia zhongguo -dongmeng diqu jingji fazhan de sikao” [The View of Sino-ASEAN Region Economic Development Under the One Belt One Road Strategy]. *Beijing: Modern Business* 8: 60-61.

呂冠頤，2018，〈中美貿易戰煙硝下RCEP的談判進程〉，<http://www.ti.tku.edu.tw/page1/recruit.php?Sn=340>，查閱時間：2018/04/24。Leu, Guan-

yi. 2018. “Zhongmei maoyi zhan yanxiao xia RCEP de tanpan jincheng” [The RCEP Negotiation Process Under the Sino-America Trade War]. (Accessed on April 24, 2018).

阮建平，2005，〈國際經濟制裁的效率與外部性分析——兼析冷戰後美國對外經濟制裁的發展〉，《武漢大學學報》，（3）：362-366。
Ruan, Jianping. 2005. “Guoji jingji zhicai de xiaolu yu waibu xing fenxi—jianxi lengzhan hou meiguo duiwai jingji zhicai de fazhan” [The Efficiency and External Analysis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 Sanctions and an Analysis of the Development of American Post Cold-War Economic Sanctions]. *Wuhan: Wuhan University Journal* (3): 362-366.

周永生，2003，〈經濟外交面臨的機遇和挑戰——經濟外交概念研究〉，《世界經濟與政治》，（7）：39-44。Zhou, Yongsheng. 2003. “Jingji waijiao mianlin de jiyu han tiaozhan—jingji waijiao gainian yanjiu”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in Economic Diplomacy - A study of the Concept of Economic Diplomacy]. *Beijing: World Economics and Politics* (7): 39-44.

林侑靜，2017，〈緬甸的改革開放與亞太大國關係發展〉，《全球政治評論》，59：105-140。Lin, Yi-ching. 2017. “Miandian de gaige kaifang yu yatai daguo guanxi fazhan” [Myanmar’s Reform and Openness and the Developing Relationship with Asia-Pacific Powers]. *Taiwan: Review of Global Politics* 59: 105-140.

林樂芬、祝楠，2015，〈中國經濟安全：挑戰與應對〉，《中國浦東幹部學院學報》，（1）：58-67。Lin, Lefen, and Nan Zhu. 2015. “Zhongguo jingji anquan: tiaozhan yu yingdui” [China’s Economic Security: Challenge and Response]. *Shanghai: Journal of China Executive Leadership Academic Pudong* 2015 (1): 58-67.

竺彩華，2015，〈中國經濟外交新範式〉，《和平與發展》，（2）：40-56。Zhu, Caihua. 2015. “Zhongguo jingji waijiao xin fanshi” [A New Paradigm for China’s Economic Diplomacy]. *Beijing: Peace and Development* (2): 40-56.

邱坤玄，2010，〈中國在周邊地區的多邊外交理論與實踐〉，《遠景基金會季刊》，11（4）：1-41。Chiu, Kun-shuan. 2010. “Zhongguo zai zhoubian diqu de duobian waijiao lilun yu shijian” [China’s Multilateral Diplomacy in its Surrounding Areas: Theory and Practice]. *Taipei: Prospect Quarterly* 11 (4): 1-41.

胡鞍鋼、馬偉、鄒一龍，2014，〈絲綢之路經濟帶：戰略內涵、定位和實現路徑〉，《新疆師範大學學報》，（2）：1-10。Hu, Angang, Wei Ma and Yilong Yan. 2014. “Sichouzhilu jingjidai: Zhanlue neihan, dingwei han shixian lujing” [The Strategic Implications, Definition and Realization of the “Silk-road Economic Belt” Strategy]. *Xinjiang: Journal of Xinjiang Normal University* (2): 1-10.

- 章紅，2011，〈東南亞國內政治對中國經濟外交的挑戰及對策思考〉，
《社會主義研究》，（4）：125-129。Hong, Wei. 2011. “Dongnanya guonei
zhengzhi dui zhongguo jingji waijiao de tiaozhan ji duice sikao” [Challenges and
Countermeasures in Domestic Southeast Asian Politics toward China’s Economic
Diplomacy]. *Beijing: Socialism Studies* (4): 125-129.
- 凌勝利，2018，〈雙重協調：中國的周邊安全戰略構建〉，《國際安全研
究》，（1）29-52。Ling, Shengli. 2018. “Shuangchong xietiao: zhongguo
de zhoubian anquan zhanlue goujian” [Dual Negotiation: China’s Peripheral
Security Strategic Building]. *Beijing: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Security Studies*
(1): 29-52.
- 孫雲，2017，〈中國對外援助為何神神秘秘？〉，<http://cn.chinausfocus.com/foreign-policy/20171027/22213.html>，查閱時間：2018/03/24。Sun,
Yun. 2017. “Zhongguo duiwai yuanzhu weihe shenshenmimi?” [Why is China’s
Foreign Aid Such a Mystery?]. (Accessed on March 24, 2018).
- 徐以升、馬鑫，2015，〈美國金融制裁的法律、執行、手段與特徵〉，
《國際經濟評論》，（1）：131-153。Xu, Yisheng and Gan Ma. 2015.
“Meiguo jinrong zhicai de falü, zhixing, shouduan yu tezheng” [The Law,
Execution, Methods and Features of American Financial Sanctions]. *Beijing:
International Economic Review* (1): 131-153.
- 徐步、張博，2017，〈中國—東盟貿易關係現狀、問題和前景展望〉，
《亞太安全與海洋研究》，（5）：1-20。Xu, Bu and Bo Zhang. 2017.
“Zhongguo-dongmeng maoyi guanxi xianzhuang, wenti han qianjing zhanwang”
[The Current State of Affairs, Issues and Prospects in Sino-ASEAN Trade
Relations]. *Beijing: Asia-Pacific Security and Maritime Affairs* (5): 1-20.
- 徐建華，2016，〈經濟外交：概念與特徵辨析〉，《深圳大學學報》，33
（5）：78-83。Xu, Jianhua. 2016. “Jingji waijiao: gainian yu tezheng bianxi”
[Economic Diplomacy: Identifying Concepts and Features]. *Shenzhen: Shenzhen
Daxue Xuebao* 33 (5): 78-83.
- 徐瑤，2013，〈中國對東盟的經濟外交——基於中國—東盟自貿區的研究〉，
《生產力研究》，（7）：71-74。Xu, yao. 2013. “Zhongguo dui
dongmeng de jingji waijiao—jiyu zhongguo-dongmeng zimao qu de yanjiu”
[China’s Economic Diplomacy Toward ASEAN - Research Based on Sino-
ASEAN Free Trade Areas]. *Shanxi: Productivity Research* (7): 71-74.
- 高程，2015，〈從中國經濟外交轉型的視角看“一帶一路”的戰略性〉，
《國際觀察》，（4）：35-48。Gao, Cheng. 2015. “Cong zhongguo jingji
waijiao zhuanxing de shijiao kan ‘yidai yilu’ de zhanluxing” [The ‘One Belt
One Road’ Strategy as Seen from the Transformation of China’s Economic
Diplomacy]. *Shanghai: International Review* (4): 35-48.

- 康霖、羅亮，2014，〈中國—東盟海上合作基金的發展及前景〉，《國際問題研究》，（5）：27-36。Kang, Lin and Liang Luo. 2014. “Zhongguo—dongmeng haishang hezuo jijin de fazhan ji qianjing” [Development and Future Prospects of the China-ASEAN Maritime Cooperation Fund]. *Beijing: International Studies* (5): 27-36.
- 張雅君，2017，〈中國東協自由貿易區對中越關係的影響〉，《遠景基金會季刊》，18（2）：45-97。Chang, Ya-chun. 2017. “Zhongguo dongxie ziyoumaoyiqu dui zhong yue guanxi de yingxiang” [The Effects of CAFTA on China-Vietnam Bilateral Relations]. *Taipei: Prospect Quarterly* 18 (2): 45-97.
- 張曉通，2013，〈中國經濟外交理論構建：一項初步的嘗試〉，《外交評論》，（6）：49-60。Zhang, Xiaotong. 2013. “Zhongguo jingji waijiao lilun goujian: yixiang chubu de changshi” [The Construction China’s Economic Diplomacy Theory Construction: A First Attempt]. *Beijing: Foreign Affairs Review* (6): 49-60.
- 張勵，2011，〈經濟外交與中國—東盟區域合作：內涵、實踐與效用〉，《東南亞縱橫》，（9）：64-68。Zhang, Li. 2011. “Jingji waijiao yu zhongguo-dongmeng quyu hezuo: neihan, shijian yu xiaoyong” [Economic Diplomacy and China-ASEAN Regional Cooperation: Content, Practice and Effects]. *Guangxi: Around Southeast Asia* (9): 64-68.
- 陳友駿，2017，〈「新常態」與中國經濟外交〉，《太平洋學報》，（12）：87-97。Chen, Youjun. 2017. “‘Xin changtai’ yu zhongguo jingji waijiao” [‘New Normal’ and China Economic Diplomacy]. *Beijing: Pacific Journal* (12): 87-97.
- 陳宇瞳、成弋威，2017〈美國金融制裁的法律分析與風險防范〉，《金融監管研究》，（1）：34-48。Chen, Yutong, and Gewei Cheng. 2017. “Meiguo jinrong zhicai de falu fenxi yu fengxian fangfan” [Analysis of American Financial Sanctions Law and Risk Prevention]. *Beijing: Financial Regulation Research* (1): 34-48.
- 傅豐誠，2017，〈大陸舉辦「一帶一路高峰合作論壇」之意義與影響〉，《展望與探索》，15（6）：8-15。Fu, Feng-cheng. 2017. “Dalu juban ‘yidai yilu gaofeng hezuo luntan’ zhi yiyi yu yingxiang” [The Implications and Impact of China’s ‘Belt and Road Forum for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Taipei: Prospect and Exploration* 15 (6): 8-15.
- 曾珠，2008，〈開放形勢下中國經濟安全問題探討〉，《廣西財經學院學報》，（2）：79-83。Zeng, Zhu. 2008. “Kaifang xingshi xia zhongguo jingji anquan wenti tantao” [Investigating China’s Economic Security Issues in an Open Setting]. *Guangxi: Journal of Guangx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2): 79-83.

- 謝琳燦，2016，〈我國對東南亞投資的現狀與風險防控〉，《宏觀經濟管理》，（1）：70-73。Xie, Lincan. 2016. “Woguo dui dongnanya touzi de xianzhuang yu fengxian fangkong” [The State of China’s Investment and Risk Management in Southeast Asia]. *Beijing: Hong Guan Jing Ji Guan Li* (1): 70-73.
- 黃風，2012，〈美國金融制裁制度及其對我國的警示〉，《法學》，（4）：123-130。Huang, Feng. 2012. “Meiguo jinrong zhicai zhidu ji chi dui woguo de jingshi” [The America Financial Sanction System and its Warning for China]. *Shanghai: Fa Xue* (4): 123-130.
- 黃瑋，2014，〈論中國經濟外交戰略及其科學管理〉，《學術論壇》，（11）：31-34。Huang, Wei. 2014. “Lun zhongguo jingji waijiao zhanlue ji qi kexue guanli” [On China Economic Diplomacy and Science Management]. *Guangxi: Academic Forum* (11): 31-34.
- 新華社，2017，〈與西方國家相反：中國對外援助穩步增加〉，<http://xinhua-rss.zhongguowangshi.com/13694/-622380394845431009/1687327.html>，查閱時間：2018/03/24。Xin Hua Daily. 2017. “Yu xifang guojia xiangfan: zhongguo duiwai yuanzhu wenbu zengjia” [In Contrast with Western Countries: China’s Foreign Aid Stably Increasing]. (Accessed on March 24, 2018).
- 楊昊，2013，〈近期中共高層的東南亞戰略佈局〉，《戰略安全研析》，98：13-20。Yang, Alan Hao. 2013. “Jinqi zhonggong gaoceng de dongnanya zhanlue buju” [The CCP Leadership’s Recent Strategic Layout in Southeast Asia]. *Taiwan: Journal of Strategic and Security Analysis* 98: 13-20.
- 楊時超，2012，〈新加坡的經濟外交〉，《國際問題研究》，（6）：109-117。Yang, Shichao. 2012. “Xinjiapo de jingji waijiao” [Singapore’s Economic Diplomacy]. *Beijing: China International Issue And Studies* 2012(6): 109-117.
- 溫芳宜，2017，〈美國及歐盟對於近期中國大陸海外併購之因應〉，《經濟前瞻》，174：73-77。Wen, Fang-yi. 2017. “Meiguo ji oumeng duiyu jinqi zhongguo dalu haiwai bingou zhi yinying” [American and European Countermeasures to China’s Overseas Mergers]. *Taiwan: Economic Outlook Bimonthly* 174: 73-77.
- 趙文志，2016，《中國大陸經濟外交的理論與實踐》，臺北：五南書局。Chao, Wen-chi. 2016. *Zhongguo dalu jingji waijiao de lilun yu shijian* [Mainland China Economic Diplomacy Theory and Practice]. Taipei: Wunan Press.
- 趙可金，2011，〈經濟外交的興起：內涵、機制與趨勢〉，《教學與研究》，（1）：56-62。Zhao, Kejin. 2011. “Jingji waijiao de xingqi: neihan, jizhi yu qushi” [The Rise of Economic Diplomacy: Implications, Mechanisms and Trends]. *Beijing: Jiao Xue Yu Yan Jiu* (1): 56-62.
- 趙長峰、聶銳，2016，〈十八大以來中國經濟外交探析〉，《社會主義

- 研究》，（1）：29-33。Zhao, Changfeng and Rui Nie. 2016. “Shibada yilai zhongguo jingji waijiao tanxi” [Analysis of Chinese Economic Diplomacy since the 18th CPC National Congress]. *Hubei: Socialism Studies* (1): 29-33.
- 趙洲，2016，〈單邊經濟制裁與「一帶一路」戰略下的貿易、投資保護〉，《社會科學家》，（1）：114-119。Zhao, Zhou. 2016. “Danbian jingji zhicai yu ‘yidai yilu’ zhanlue xia de maoyi, touzi baohu” [Bilateral Economic Sanctions and the Protection of Trade and Investment under the One Belt One Road Strategy]. *Guangxi: Social Scientist* (1): 114-119.
- 劉孟俊、謝頌遇，2017，〈前瞻中共十九大後經貿政策走向〉，《經濟前瞻》，174：9-14。Liu, Meng-chun, and Sung-yu Hsieh. 2017. “Qianzhan zhonggong shijiuda he jingmao zhengce zouxiang” [Outlook of the Direction of Economic and Trade Policies since the 19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Taiwan: Economic Outlook Bimonthly* 174: 9-14.
- 蔡東杰，2014，〈當代中國外交政策〉，臺北：五南書局。Tsai, Tung-chieh. 2014. *Dangdai zhongguo waijiao zhengce* [Current China Foreign Policy]. Taipei: Wunan Press.
- 鄧克禮，2016，〈中國對東協外交戰略中的共同發展倡議：概念與實踐〉，《臺灣東南亞學刊》，11（2）：83-106。Teng, Ke-li. 2016. “Zhongguo dui dongxie waijiao zhanlue zhong de gongtong fazhan changyi: gainian yu shijian” [The Initiative of Co-Development in China’s ASEAN Diplomacy: Concepts and Practices]. *Nantou: Taiwan Journal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11 (2): 83-106.
- 閻梁，2012，〈中國對外經濟制裁：目標與政策議題〉，《外交評論》，（6）：16-29。Yan, Liang. 2012. “Zhongguo duiwai jingji zhicai: mubiao yu zhengce yiti” [China’s Foreign Economic Sanctions: Targets and Policy Issues]. *Beijing: Foreign Affairs Review* (6): 16-29.
- 閻學通，2015，〈整體的周邊比美國更重要〉，<http://opinion.huanqiu.com/1152/2015-01/5392162.html>。Yen, Xuotong. 2015. “Zhengti de zhoubian bi meiguo gen zhongyao” [The Periphery as a Whole is Far More Important Than America].
- 聯合報，2018，〈一帶一路指標，印尼雅萬高鐵將延期完工〉，<https://udn.com/news/story/6811/2991223>，查閱時間：2018/03/24。United Daily News. 2018. “Yidai yilu zhibiao, yinni yawan gaotie jiang yanqi wangong” [A Target of One Belt One Road: Indonesian Jakarta-Bandung high-speed rail to be postponed]. (Accessed on March 24, 2018).
- 顏潔，2017，〈第十屆中國—東盟智庫戰略對話論壇會議綜述〉，《東南亞縱橫》，（6）：3-7。Yan, Jie. 2017. “Di shi jie zhongguo-dongnmgeng

zhiku zhanlue duihua luntan huiyi zongshu” [A Review of the 10th China-ASEAN Think Tank Strategic Dialogue Forum]. *Guangxi: Around Southeast Asia* (6): 3-7.

魏涵，2014，〈二戰以後中國對東南亞的經濟外交探討〉，《現代商貿工業》，(11)：79-80。Wei, Han. 2014. “Erzhan yihou zhongguo due dongnanya de jingji waijiao tantao” [China’s Post-World War II Economic Diplomacy toward Southeast Asia]. *Hubei: Modern Business Trade Industry* (11): 79-80.

BBC中文網，2017，〈閒置兩年後，中緬原油管道終於開通〉，<http://www.bbc.com/zhongwen/trad/chinese-news-39559135>，查閱時間：2018/03/24。BBC Chinese. 2017. “Xianzhi liangnian hou, zhong mian yuanyou guandao zhongyu kaitong” [Left idle for two years, the Sino-Myanmar crude oil pipeline is now finally open.]. (Accessed on March 24, 2018).

ETtoday 新聞雲，2017，〈2017掌權靠「亞洲水塔」，中國狂築水壩控制中南半島〉，<https://www.ettoday.net/news/20170829/999580.htm>，查閱時間：2018/03/24。ETtoday. “2017 zhangquan kao ‘Yazhou shuita’, zhongguo kuangzhu shuiba kongzhi zhongnanbandao” [Being ‘Asia’s Water Tower’ to Stay on Top: China’s Frenzied Dam Construction for Control over Indochina]. (Accessed on March 24, 2018).

二、英文

ASEAN Secretariat. 2017. “ASEAN Statistics Yearbook 2016-2017.” http://asean.org/?static_post=asean-statistical-yearbook-2016-2017. (Accessed on March 25, 2018).

Ba, Alice D. 2016. “Tpp, Obor and Asean: Where Will They Lead To?” *RSIS Commentaries* 108: 1-4.

Ba, Alice D. 2006. “Who’s Socializing Whom? Complex Engagement in Sino-Asean Relations.” *The Pacific Review* 19 (2): 157-79.

Baldwin, David Allen. 1985. *Economic statecraft*. Bos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Bayne, N. and Stephen Woolcock. 2003. *The New Economic Diplomacy: Decision-Making and Negotiation in International Economic Relations*. Burlington: Ashgate Publishing Company.

Berridge, Geoff, and Alan James. 2012. *Dictionary of Diplomacy*. Sprinter: The Palgrave Macmillan.

- Blanchard, Jean-Marc F and Norrin M. Ripsman. 2008. "A Political Theory of Economic Statecraft." *Foreign Policy Analysis* 4 (4): 371-98.
- Bloomberg. 2018. "Malaysia's Mahathir Pledges to Review China Investment If Re-Elected." <https://www.bloomberg.com/news/articles/2018-04-08/mahathir-pledges-to-review-china-investment-after-malaysia-vote>. (Accessed on April 25, 2018).
- Drezner, DW. 2003. "The Hidden Hand of Economic Coercion."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57 (3): 643-59.
- Elliott, Kimberly Ann, and Gary Clyde Hufbauer. 1999. "Same Song, Same Refrain? Economic Sanctions in the 1990'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89 (2): 403-408.
- Goh, Evelyn. 2016. "Southeast Asian Strategies toward the Great Powers: Still Hedging after All These Years?" <http://www.theasanforum.org/southeast-asian-strategies-toward-the-great-powers-still-hedging-after-all-these-years/>. (Accessed on March 25, 2018).
- Gonzalez-Vicente, Ruben. 2011.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the Chinese State." *Political Geography* 30 (7): 402-411.
- Haass, Richard N. 1997. "Sanctioning Madness." *Foreign Affairs* 76 (6): 74-85.
- Hirschman, Albert O. 1980. *National power and the structure of foreign trade*. Californi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Hufbauer, Gary Clyde., Jeffrey J. Schott, and Kimberly Ann Elliott. 1990. *Economic Sanctions Reconsidered: History and Current Policy*. Washington D.C.: Peterson Institute.
- Kuik, Cheng-Chwee. 2005. "Multilateralism in China's Asean Policy: Its Evolution, Characteristics, and Aspiration." *Contemporary Southeast Asia* 2005: 102-22.
- Kuik, Cheng-Chwee. 2008. "The Essence of Hedging: Malaysia and Singapore's Response to a Rising China." *Contemporary Southeast Asia: A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nd Strategic Affairs* 30 (2): 159-185.
- Kuik, Cheng-Chwee. 2017. "Explaining the Contradiction in China's South China Sea Policy: Structural Drivers and Domestic Imperatives." *China: 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15 (1): 163-86.
- Kuik, Cheng-Chwee. 2018. "Power Transitions Threaten ASEAN's Hedging Role." *East Asia Forum Quarterly* March, 2018.
- Leu, Guanyi. 2011. "Asean's Preferential Trade Agreements Strategy." *Journal of Current Southeast Asian Affairs* 30 (2): 31-64.

- Leu, Guanyi. 2018. "The Aspects and Challenges of China-Southeast Asia Economic Cooperation." <http://www.ti.tku.edu.tw/app/recruit.php?Sn=372>. (Accessed on October 28, 2018).
- Liou, Chih-shian. 2009. "Bureaucratic Politics and Overseas Investment by Chinese State-Owned Oil Companies: Illusory Champions." *Asian Survey* 49 (4): 670-90.
- Manero, Elizabeth. 2017. "China's Investment in Africa: The New Colonialism?" <http://harvardpolitics.com/world/chinas-investment-in-africa-the-new-colonialism/>. (Accessed on April 25, 2018).
- Ng, Edward. 2017. "The Rise of Chinese FDI into ASEAN." <https://en.nikkoam.com/articles/2017/10/the-rise-of-chinese-fdi-into-asean>. (Accessed on April 25, 2018).
- Okano-Heijmans, Maaïke. 2012. "Japan's New Economic Diplomacy: Changing Tactics or Strategy?" *Asia-Pacific Review* 19 (1): 62-87.
- Pape, Robert A. 1997. "Why Economic Sanctions Do Not Work." *International security* 22 (2): 90-136.
- Pape, Robert A. 1998. "Why Economic Sanctions Still Do Not Work." *International Security* 23 (1): 66-77.
- Pekkanen, S. M. M. Solis, S. N. Karada. 2007. "Trading Gains for Control: International Trade Forums and Japanese Economic Diplomacy."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51 (4): 945-970.
- Reilly, James. 2012. "121"China's Unilateral Sanctions." *The Washington Quarterly* 35 (4): 121-33.
- Saner, Raymond, and Yiu, Lichia. 2003. "International Economic Diplomacy: Mutations in Post-ModernTimes." (2003). <http://www.diplomacydialogue.org/images/files/20030109-DP-DSP.pdf>. (Accessed on April 25, 2018).
- Womack, Brantly. 2004. "China's Southeast Asia Policy: A Success Story for the Third Generation." *Cross-Strait and International Affairs Quarterly* 1 (1): 161-183.
- Woolcock, Stephen, and Nicholas Bayne. 2017. *The New Economic Diplomacy: Decision Making and Negotiation in International Economic Relations*. New York: Routledge.
- Yoshimatsu, H., and D. Trinidad. 2010. "Development Assistance, Strategic Interests, and the China Factor in Japan's Role in Asean Integration." *Japanese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11 (2): 199-219.

Zhu, Zhenming. 2009. "China's Economic Aid to CLMV and Its Economic Cooperation with Them." *Institute of Developing Economies-Japan External Trade Organization* 2009: 69-106

聯絡作者：呂冠頤

聯絡地址：新北市淡水區英專路151號驚聲大樓T810室

電子信箱：gleu@mail.tku.edu.tw

收稿日期：2018/05/17

審稿通過：2018/10/03

責任編輯：高士元、鄧峻丞、宋淳暄、何育墉